

第四章 儒學人物類型與成就之掌握

根據前一章江藩《漢學師承記》與《宋學淵源記》二書，入傳人物的基本原則，以及敘述資料的分析，包括籍貫、生卒年、著述、學術特色、師承關係，以及與時人的交遊等，將有助於了解清儒的基本背景與生命情懷。

江藩在《漢學師承記》、《宋學淵源記》中，對清儒人物學行的各色樣貌，多所著墨，特別留意人倫之間，符合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之軌範。本章將依「人倫」次第作為論述順序，首先從清儒「修身」、「齊家」之處著眼，描繪其人物的學行；其次依「治國、平天下」之範疇立論，論述清儒的事功；最後探討清代儒者之學術成就。

本文所謂的「人物學行」，是依照儒家所謂「修身」、「齊家」之範疇逐漸擴寫，描繪清儒之特殊事蹟、孝親、治家狀況，以及與友朋、師長交遊之學習情狀，以期展現儒者自孔門以來所遵行之學行風範。

其次，本文所謂的「事功」，是以「治國、平天下」之理念為論述基礎。指出清儒將其所學實踐於政治理念之上，描摹出清儒為表彰氣節，而不願同流合汙，以及明清內憂外患頻仍之際，抵禦外侮死守家園，終獲得人心之情事。此乃儒者為學之最終實踐，亦是「窮則獨善其身，達則兼善天下」之理想實現。

最後，所謂之「治學成就」，則是運用歸納法，將清儒在經學、史學及其他類項的研究成果，分門別類並提出其獨到見解與看法，抑或是在該學術領域中，所作出之貢獻。

第一節 清儒之人物學行

儒家講求道德人文，要求社會「父子有親，君臣有義，夫婦有別，長幼有序，朋友有信」（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），期許「人倫」秩序的安定和諧，所以每一個人都把「修身」——即個人道德修養和人格的完善——作為最基本的課題。〈大學〉裡更是具體闡明修身與治天下之關係。〈大學〉云：

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，先治其國；欲治其國者，先齊其家；欲齊其家者，先修其身；欲修其身者，先正其心……心正而身修，身修而後家齊，家齊

而後國治，國治而後天下平。¹

只有自身道德完美，達到了「內聖」，方能進一步做到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的「外王」事業。²

中國知識分子致力於道德修養，期待人格完善，在清代儒者的身上同樣可見。誠如〈大學〉所言：「自天子以至於庶人，壹是皆以修身爲本。」³在《論語》中子路曾問「君子」，孔子的回答是「修己以敬」、「修己以安人」、「修己以安百姓」（《論語·憲問》）。同樣道理，身爲君子的首要條件是「修己以敬」，即個人道德的自我完善，然後再求能「安人」、「安百姓」。所以〈中庸〉云：「知所以修身，則知所以治人，知所以治人，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。」⁴因此〈中庸〉即談到如何實踐「修身」的內容：

故君子，不可以不修身；思修身，不可以不事親；思事親，不可以不知人；思知人，不可以不知天。⁵

因此想到修身，不可以不包含孝敬父母之事；想到孝敬父母，又必須知曉人事之理，因此就應懂得天下之道，而天下之道，在於君臣、父子、夫婦、兄弟、朋友。「修身」是要求人們要不斷地涵養自身言行，考驗自身如何在人倫之中立身處世，就像本節中清儒不但力求學養豐富，在與父母、兄弟、夫婦、朋友間，亦能依禮處世，展現其在人倫社會中，事親至孝、兄友弟恭、夫婦有情、朋友有義的人倫關懷。

本節中將分作兩個層次探討：一是就「人倫」次第，「修身」、「齊家」範疇，依江藩所述之儒者身形事蹟、孝親形象略作說明，當然其中也有不善置產以致貧困以終的情形，藉以描繪清代儒者立身處世之形象；二是就清儒治學樣貌爲描述主體，依儒者讀書與當時師友交往之情狀，一窺清儒人物學行之樣貌。

在這二個層次中，我們將可以觀察以下幾個要點：一、江藩所要凸顯儒者立身處世的形象爲何？二、清儒的讀書樣貌有何特殊之處？三、清儒友朋間的互動，是否僅止於同好者，或治學理念相同之人。由此我們更將可檢視清代儒者間

¹朱熹：〈大學章句〉，《四書章句集注》（台北：大安出版社，1986年4月），頁3-4。

²吳光：《儒家哲學片論》（台北：允晨出版社，1990年6月），頁231-232。

³朱熹：〈大學章句〉，《四書章句集注》，頁4。

⁴朱熹：〈中庸章句〉，《四書章句集注》，頁29。

⁵朱熹：〈中庸章句〉，《四書章句集注》，頁28。

彼此的互動關係以及清儒一切言行是否符合儒家立身處世原則。

壹、人物身形、軼事

儒者以君子為目標，故其平日之一言一行，謹守風範，江藩對清儒的身形及其個人特殊行蹟，皆以不少筆墨描摹，以下分別就人物身形、人物事蹟二個面向作一分析：

一、人物身形

江藩在書中刻意描述人物身形，共有四位儒者，對閻若璩的介紹，並非直接詮釋，而是藉其祖父之口，云：「若璩生，世科愛之，常抱置膝上，摩其頂曰：『汝貌文，其為一代儒者，以光吾宗乎！』」⁶由祖父視若璩相貌文質彬彬，便斷定將成為一代大儒，也暗示家風所在。

對余蕭客的身形描述更為生動，幾乎給予個人特寫，「先生狀貌奇偉，頂有二肉角，疎眉大眼，口侈多髯，如軌革家懸鬼谷子像，故同社中戲呼為鬼谷子。」⁷，凸顯其臉部特寫「大眼、多髯、頂有二角」，並以同社中學人對其稱號「鬼谷子」，予人印象深刻。

另外，武億身形魁梧，云：「君生而狀貌魁梧，有兼人之力，兼人之量。」⁸，襯托其健美之形狀。江藩對於前三位儒者的描寫僅止於靜態素描，獨對程晉芳之形容則是「君生而頎長，美鬚髯。酒酣耳熱，縱論時事，則掀髯大笑。」⁹，先言「君生而頎長，美鬚髯」，又舉與時人飲酌時，喜談時事，常相談甚歡，不時「掀髯大笑」，形象更為鮮明，清儒用心為學，然其形象遂於江藩筆墨間生動呈現。

二、人物軼事

學者附庸風雅，名號甚多，尤其軼事流傳，更具特色，江藩對於儒者封號，多所說明，描述原由，在卷二描述其先師，云：

⁶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一，頁4。

⁷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二，頁31-32。

⁸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四，頁71。

⁹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七，頁111。

海內學者稱為紅豆先生，初，研谿先生由東渚邨遷居郡城東南香谿之北，郡城東禪寺有紅豆一株，相傳白鴿禪師所種，老而枯矣。至是時，復生新枝，研谿先生移一枝植堦前，生意郁然，僧睿目存為繪〈紅豆新居圖〉，自題五絕句，又賦〈紅豆詞〉十首，和者二百餘人。四方名士過吳門者，必停舟訪焉。因自號紅豆主人。所以鄉人稱研谿先生曰「老紅豆先生」，半農先生曰「紅豆先生」，松崖先生曰「小紅豆先生」。¹⁰

「紅豆先生」之美名，在當時學界不競而走。

同樣以植物命名者，如袁廷燾名其書房，由於「得洞庭山徐尚書健菴留植於金氏聽濤閣下之紅蕙，種之階前，名其室曰紅蕙山房」¹¹，以此命名為稱號、室名。而江聲晚年，則因其個性，取以自號，云：「因性不諧俗，動與時違，取周易艮背之義，自號艮庭，學者稱為艮庭先生」¹²。

其他如王昶及紀昀二位先生，在出生時，有一段祥兆，如王昶父親年四十五無子，至杭州靈隱寺祈禱，書云：

夢人贈以蘭，明日市蘭歸，逾兩旬，蘭茁二枝。一出土即隕，其一長尺有六寸，森森若巨竹狀。及夏，紫燕棲於楹，同巢異穴。至冬，陸太夫人孕男不育，而錢太夫人生先生，咸以為蘭徵燕兆也。¹³

故王昶先生，一號蘭泉，更由此祥徵，暗示一代大儒之不凡。

紀昀將出生前，祖父天申夜夢，云：「天雨，則窪中汪洋成巨浸，夜有火光，天申夜夢火光入樓中，而公生，火光遂隱，人以爲公乃靈物託生也」¹⁴，姑且不論是否為穿鑿附會之說，王、紀二人皆於四、五歲時，聰穎過人，時人目為神童，則是確有之記載，因此江藩特錄下二人出生時之傳說，或許欲突顯出清儒之穎悟非凡，成爲一代儒者，乃是天命使然。

清代多位大儒於家人及鄉里間多有特殊行誼，值得大書特書。像是李中孚欲從軍之時，即以一落齒交予妻子，曰：「賊氛甚熾，此行恐不能生還，見齒如見

¹⁰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二，頁 22。

¹¹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四，頁 60-61。

¹²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二，頁 36。

¹³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四，頁 53。

¹⁴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六，頁 94。

我也。」¹⁵李中孚明知此去可能殉國，卻仍毅然決然願為國犧牲，後李中孚以落齒與母合葬，名為齒冢，節義可風，更可見儒者骨氣所在。

朱用純¹⁶、鄧元昌、劉原淥皆是友愛兄弟，盡孝悌之道的儒者。其中論到鄧元昌，書云：

有兄瞽而頑，大小事，必告而行。……每怒，元昌長跪請罪，必釋乃已。後母弟及弟婦，元昌待之甚厚。弟死，有子，婦泣請于元昌曰：「感伯之德，誓不他適，願苦守，撫孤兒。」元昌亦泣拜之，自是不入內處，攜其子，寢于中堂，課其子與弟之子，後皆成立。¹⁷

鄧元昌對待兄長如此恭敬，其死後對待弟婦、姪子亦盡乎道義，難能可貴。而劉原淥之兄重病，竟祈天願「以身代兄死」¹⁸，二人對待兄弟之義，皇天亦感動之。

然而亦有相反之事，兄對弟之不義，如徐復死後無子，兄長竟要賣其妻作土豪小妾，妻子渾然不知，書云：

誑以上塚，賺至豪家，婦忽舉止異常，行狀聲音，宛如心仲（徐復），指豪大呼曰：「汝何人？敢買我妻為妾乎！」婦遂仆地，其兄遁去，俄頃，婦醒，遽入廚，取廚刀自刎，死。其兄至今仍無恙也。¹⁹

徐復雖已身歿為鬼，但依然神靈昭著，保全其妻之名節，但此事以後，竟對其兄無任何懲治，即使化為人鬼，兄弟情義尚在，而無施予報復，則儒者之寬厚，於此可知。

清儒不僅有兄弟之義，對傭工下隸、鄉里之人亦頗以道感化之，像是勞史「引接後學，委曲盡誠，傭工下隸，皆引之向道，曰：『盡汝分所當為，務實作去，終身不懈，即是賢人，勿自棄也。』」²⁰因此又德化於鄉里，商人不賣偽物，鄰里有爭端者，多請求其論曲直，鄉里學童皆服其所教，一鄉之中，有洙泗之風。而勞史另值得一書之事，便他預言己之將死，書曰：

¹⁵江藩：《宋學淵源記》卷上，頁5。

¹⁶江藩：《宋學淵源記》卷下，頁16。

¹⁷江藩：《宋學淵源記》卷下，頁27。

¹⁸江藩：《宋學淵源記》卷上，頁10。

¹⁹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七，頁119。

²⁰江藩：《宋學淵源記》卷下，頁23。

弟子桑調元自錢塘來謁，論學數日，臨行，送之曰：「我壽不過三年，恐不復相見矣！」後三年九月，語弟子汪鑒曰：「今月某日，吾其逝乎！」遂徧詣親友家飯，與老者言所以教，與少者言所以學，令家人治木，飭喪事，死之前一夕，趣具湯沐，至期而歿。²¹

或謂勞史能通天人，將死之前仍不忘遺惠後人。同樣以德服鄉里者有任德成，對偷兒能循循善誘，同里之中津津樂道²²；而應撝謙對鄉里中之惡少，好言相勸，使少年俯首認罪²³，皆是儒者立身鄉里、移風化俗之例。

江藩之師薛起鳳與勞史之行蹟頗有相似之處，其對江藩之教，書云：

藩從先生受句讀，方十二齡，即諭以涵養工夫。一日，藩怒叱僕人，先生婉言開導曰：「讀書以變化氣質為先，女如此氣質，尚能讀書乎？況彼亦人子也，為女役者，逼于饑寒耳！方哀矜之不暇，忍加訶責耶？」²⁴

薛氏與勞史皆以德化教人，醇厚誠懇，乃異曲同工！後來薛起鳳得重病，「歸，筮之不吉，書紙尾曰：『勿起妄心，勿生妄見，修德懺悔，時哉時哉！』尋卒」²⁵，將死之前，出金代姊償還債，同樣不忘遺澤於家人。

另有清儒施璜嚴守誠信，「在東林時將歸，與世泰約，某年某月日來赴講會，及期，世泰設榻以待，或曰：『千里之期，能必信乎？』曰：『施生篤行君子也，必如約，如失信不至，吾不復相天下士矣！』言未終，而璜挈其子至矣！」²⁶由江藩所述此例得知，施璜與高世泰二人的講求誠信，可媲美於漢朝的張劭與范式，中國士人堅守君子誠信之道，至清代學人以此自律，儒風之效，於此可知。

秦恩復為人謙抑不自滿，絕口不談學問之事，故世無知者。²⁷江藩之業師汪縉亦是如此，書云：

²¹江藩：《宋學淵源記》卷下，頁 23。

²²江藩：《宋學淵源記》卷下，頁 26。

²³江藩：《宋學淵源記》卷下，頁 18。

²⁴江藩：《宋學淵源記》附記，頁 31。

²⁵江藩：《宋學淵源記》附記，頁 31。

²⁶江藩：《宋學淵源記》卷下，頁 19。

²⁷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七，頁 123。

歸而閉戶習靜，不復應科舉，作無名先生傳曰：「先生講學，不朱不王；先生著書，不孟不莊；先生吟詩，不宋不唐；先生為人，不獮不狂；先生處世，不圓不方。」復作歌曰：「先生有耳聽清風，先生有眼看明月，先生有身神仙人，先生有家山水窟，先生于世無不有。」²⁸

可見清儒之學爲己，不願爲世俗所擾，謙沖自牧，安身立命，篤實自信能默默爲學術而努力。另一人彭紹升曾下榻於江藩家中，並與藩父談論身世之不偶，藩父曰：「傳有之，富貴在天，雖一矜，亦有定數，子學儒學佛，十有餘年，胸中尙不能消秀才二字，學道何爲？」於是頓時豁然開朗，謂藩曰：「聞丈言，醍醐灌我頂矣！」²⁹江藩特書於此，可明白江藩對於功名舉業之念，早已不耿於懷。

孫若羣、孫景烈、高愈等人，則言動有則，潔身自持。孫景烈教生徒克己復禮，自身亦以身作則，「居平雖盛暑，必肅衣冠，韓城王文端公爲入室弟子，嘗語人曰：『先生冬不爐，夏不扇，如邵康節，學行如薛文清。』」³⁰孫若羣被鄉里喻爲「小聖人」³¹，高愈亦同樣被稱作「君子人也」³²。以上諸儒皆能行道由己，方能以此喻人，爲人所敬佩。

另二人朱筠、汪元亮爲學經歷有其特殊之處，朱筠性愛山水，每經名山勝景，必登其頂，題名於上而後下。又喜豪飲，「每酒酣耳熱時，議論天下事，自比李元禮、范孟博，激揚清濁，分別邪正，慷慨激昂，聞者悚然」³³，朱筠乃性情中人，即使黃湯下肚，所議論之事亦分毫不差。

而汪元亮則令人甚爲惋惜，「少時得狂疾，忽已忽作，作時，不省人事，日夕叫罵，纏綿幾二十年。所有著述，於疾作時皆投諸火，僅存詩古文而已」³⁴，可知其在精神情緒時常失控之時，亦不輟其學，雖存下作品甚少，然其言行自留存於後世。

綜合上述，江藩書中述及清儒個人形象，於行誼事蹟上多所著墨，包括：稱號的由來，克己復禮、潔身自持，對兄弟情義之事，以德感化鄰里鄉民，對友朋嚴守誠信，謙抑不驕矜的爲學之道等；尙包含奇人軼事部分，其中有王昶、紀昀

²⁸江藩：《宋學淵源記》附記，頁 35。

²⁹江藩：《宋學淵源記》附記，頁 38。

³⁰江藩：《宋學淵源記》卷上，頁 12。

³¹江藩：《宋學淵源記》卷上，頁 8-9。

³²江藩：《宋學淵源記》卷下，頁 21。

³³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四，頁 68。

³⁴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六，頁 104。

的出生祥兆，勞史、薛起鳳能推算入棺之日，汪元亮得狂疾而焚其書等。事雖屬不經，但狷介自持形象更爲鮮明，清儒修身自持的良好形象，實無分漢儒或宋儒，皆能固守儒門一脈相傳之道。

貳、孝親形象

中國文化以「孝」爲道德核心，從夏商周三代以來，其社會統治形式，即是血緣氏族的宗法制度，因此「孝」成爲鞏固宗法制度的一種意識型態。³⁵到了孔子，「孝」字得到擴展，孔子講孝並非「唯命是從」，而是「事父母幾諫，見志不從，又敬不違，勞而不怨」（《論語·里仁》），顯示孔子並非教人愚孝，而是委婉勸告，而孟懿子問孝時，孔子曰：「無違」，云：「生，事之以禮；死，葬之以禮，祭之以禮。」（《論語·爲政》）詳實說出孝道的具體實踐。又在子游問如何實踐孝道時，說出「今之孝者，是謂能養。至於犬馬，皆能有養。不敬，何以別乎？」（《論語·爲政》）可見孝順並非在於口體奉養，而是誠敬侍奉之。另外，孔子云：「父在，觀其志；父沒，觀其行；三年而無改於父之道，可謂孝矣！」（《論語·學而》）因此無論父母健在與否，皆要無悖於孝。而曾子進一步擴大孝的內涵，云：「身也者，父母之遺體也。行父母之遺體，敢不敬乎？居處不莊，非孝也；事君不忠，非孝也；涖官不敬，非孝也；朋友不信，非孝也；戰陣無勇，非孝也。」³⁶因此，人的一言一行都與孝密切相關，百行孝爲先，行孝是天經地義之事，更是古今奉之不變之理，因此清儒謹守孝道，其侍親盡孝之事，足爲後世模範。

在江藩筆下，《漢學師承記》、《宋學淵源記》二書中，計孝親形象的有十八位儒者。歸納其中有三個層次：一是父母在世時，事父母盡孝；二是父母亡故後，哀慟親故；三是即使父母已逝，祭祀盡禮，以下分述之。

一、事父母盡孝

漢學家馬驥³⁷、洪榜³⁸及宋學家邵曾可³⁹皆以孝聞於鄉里，爲人以孝弟爲本。

³⁵陳國慶：《中華儒家精神》（河北：西北大學，1999年1月），頁97-98。

³⁶孔穎達疏：《禮記注疏》（《十三經注疏本》台北：藝文出版社，1955年），卷四十八〈祭義第二十四〉，頁821。

³⁷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一，頁16。

³⁸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六，頁100。

³⁹江藩：《宋學淵源記》卷下，頁14。

更有多位儒者事親至孝，如汪中⁴⁰、程登泰⁴¹在母親得重疾時，隨侍在側，事必躬親，甚至憂勞過度得「咯血疾」，可謂孝子。

另外，凌廷堪為得親歡心，「母偶不懌，必長跪以請，俟母笑乃起。」而「母沒，哀毀骨立，眚一目。」⁴²此情此景，令人動容。同樣劉台拱則事繼母如生母，「奉養無缺，得親歡心。體夙清羸，疊遭大故，飯疏食淡，哀毀過情，臥病不起。」⁴³可見清儒為得親歡心，如此盡心，親歿，則宛如身判死刑，哀痛欲絕，一切發乎至情。

最為有名的是李因篤以母老辭官，「是時秉鈞者聞其名，必欲致之，大吏承風旨，縣官加意迫促，因篤將以死拒，其母勸之行，始涕泣就道」，後又因母老且病，故上疏之陳情表，江藩書中不憚冗長，具以收錄，並稱此為「本朝兩大文章之一」，最後終能感動上位者，而能「奉母家居晨夕，不離左右」⁴⁴。在在揭示無論是漢儒抑或是宋儒，其事親之情狀，實無分軒輊，而清儒稟性醇厚，於人倫之間，最為明顯。

二、哀慟親故

孔子曾提到對父母盡孝道，不僅生前如是，死後應亦如是，所謂「生，事之以禮；死，葬之以禮，祭之以禮。」（《論語·為政》）洪亮吉、高愈二人，聽聞父母亡故，竟「大慟，失足落水，遇汲者救甦。既以不得視含斂為終生之恨，遂絕粒」⁴⁵，並在居喪期間，「不內寢，不飲酒食肉」⁴⁶，可見儒者在失去雙親時，哀慟欲絕，篤守禮教，守喪三年的情狀。

另外，更有賣身葬父的姜國霖，父死後，無錢買棺，竟欲賣身葬父，書云：

以衣裹尸，負之行，乞食歸里，如此忍辱負重。回歸鄉里之後，哭訴於族人曰：「父死不能斂，又不能葬，欲以身殉，又有老母在，長者何以教我？」

47

⁴⁰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七，頁 115。

⁴¹江藩：《宋學淵源記》卷下，頁 25。

⁴²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七，頁 122。

⁴³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七，頁 118。

⁴⁴江藩：《宋學淵源記》卷上，頁 8。

⁴⁵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四，頁 72。

⁴⁶江藩：《宋學淵源記》卷下，頁 21。

⁴⁷江藩：《宋學淵源記》卷上，頁 10-11。

族人憐憫國霖至孝，因此捐金以葬其父。另有像刁包、汪鑒、孔廣森等，爲了父母亡故，也是哀痛逾恆，清儒篤實嚴謹，卻也有其至情一面。

汪鑒護喪歸，乘船遇大風，「抱棺大哭，誓以身殉」⁴⁸，爲扶回父親靈柩，即使身死亦在所不惜。而刁包在居父喪時，竟慟哭至鬚髮盡白，守古禮三年之喪。後母亦亡，「大哭，嘔血數升，以毀卒」，將死之時，「肅衣冠起坐，命子濂告先人及高子主前，俄曰：『吾胸中無一事，去矣！』遂逝」⁴⁹。孔廣森本身即淡泊名利，在得知家難後，欲回故居，然「爲訟所累，扶病奔走江淮河洛間，卒卒無歡悰，未幾，居大母與父喪」⁵⁰。三位乃一代大儒，在父母相繼亡後，禁不住失去親人的悲痛，最後憂傷過度，竟也一命嗚呼了，令人不勝唏噓！

三、祭祀盡禮

孫奇逢⁵¹、黃商衡、李中孚⁵²三人於至親死後，不僅居喪盡禮，更爲雙親爭取立祠，黃商衡之父甚至得「擇日，奉主入忠孝祠」⁵³。

而清代大儒黃宗羲，父親遭受逆閹魏忠賢誣陷，冤死於獄中。父仇不共戴天，即使逆閹已死，仍上疏「請誅曹欽程、李實，蓋忠端削籍，乃欽程奉奄旨論劾，而李實則成丙寅黨禍之首者也」⁵⁴。最後涉及此事的佞臣曹欽程、李實、許顯純、崔應元等人皆得其惡果，其中有牢子葉咨、顏文仲，黃宗羲不惜以錐擊斃二人，幸而「思宗憫其孝，不之罪也」。復仇的最後一步，還是「宗羲在京師，歐應元胸，拔其鬚歸，焚而祭之忠端木主前，乃治喪事」⁵⁵，可見父仇是不除不快，而其孝行也感動皇上，即使違法，皇上也不忍苛責了，雖有違儒家以德報怨之說，但江藩有意藉此事，以明貪賊枉法之徒，終將得惡報下場，以振人心。

清儒孝親所爲，令人不禁爲之鼻酸，其能在父母在世時，恪遵孝道，寧可放棄功名利祿，也要辭官奉養，不離不棄。父母重疾時，隨侍在側，甚有自己因此得重病者。而父母過世時，清儒哀慟欲絕，堅持親守三年喪，哀毀骨立，甚至因而喪命，在在顯示清儒篤守人倫之教。而在父母亡故後，有竭力爲雙親立祠者，更有爲親復仇者。清儒恪遵孝道，也爲儒士塑造一完美形象。

⁴⁸江藩：《宋學淵源記》卷下，頁 23。

⁴⁹江藩：《宋學淵源記》卷上，頁 4。

⁵⁰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六，頁 104。

⁵¹江藩：《宋學淵源記》卷上，頁 3。

⁵²江藩：《宋學淵源記》卷上，頁 5。

⁵³江藩：《宋學淵源記》卷下，頁 25。

⁵⁴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八，頁 125。

⁵⁵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八，頁 126。

參、不善置產，困頓以終

由於清儒究心研讀學問，對於生活瑣事多不關心，即使多位儒者出身富有，但由於不善置產，最後也落得貧困以終。像是江藩筆下所述袁廷燾，出身望族，「喜揮霍，急人之難，坐是中落，乃奔走江浙間，歲無虛日矣」⁵⁶，因為救助朋友之急難，甚至為僧侶蓋精舍，家產揮霍殆盡，可見其寧為朋友之義，無視於財富之情操。

另一人即是高愈，事親至孝，善待家人，原本「家有田數十頃，性好施予，所入錢穀，隨手輒盡」，因為不善治產，晚年「坐是大困，嘗啜粥七日，尙挈子登城遠眺，可謂貧而樂矣」⁵⁷，然而即使晚年困頓，亦不改其樂，可見清儒視錢財乃身外之物，並絲毫無損於向學之志。

程晉芳亦是不善治生，由於家事皆委託於僕人治理，因此最後落得「貧不能供饘粥，以至責戶剝啄之聲，不絕於耳」⁵⁸。家中原本蓄書五萬卷，但生性好客，四方名流至家中川流不息之情景，至晚年已不復見，真是不勝唏噓。

此中似乎流露出江藩自身背景之真情，江藩晚年膝下無子，由於又不善治生，善財結客，隨手揮霍，因而晚景淒涼，然其不忘整理著作，後交給族姪刊刻。是故江藩與清儒不以此為苦，依然「伏案著書，若無事然」⁵⁹，誠如孟子所云「貧賤不能移」（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），以及顏淵的「居陋巷，一簞食一瓢飲，人不堪其憂，回也不改其樂」（《論語·述而》），堅定至此，誠乃樂學向道之使然。

肆、讀書樣態

清儒家境普遍不甚優渥，求學不易，但皆堅定自持，勤學不怠。在江藩筆下所描述的三十七位學人中，有些天賦異秉，有些勤奮向學，而終能成為大儒。此中可歸納三個特色：一是生來遲緩，卻突發穎悟；二是生來即穎悟異常；三是篤志向學，力學不倦，以下就此三項特色分述之。

⁵⁶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四，頁 61。

⁵⁷江藩：《宋學淵源記》卷下，頁 21。

⁵⁸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七，頁 111。

⁵⁹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七，頁 111。

一、生來遲緩，卻突發穎悟

閻若璩與汪縉生性遲鈍，不善背誦，但仍力學不輟，終究皇天不負苦心人，二人在年十五、六歲時，閻若璩突然在「冬夜讀書，扞格不通，憤悱不寐，漏四下，寒甚，堅坐沈思，心忽開朗，自是穎悟異常」⁶⁰，而汪縉文章則能「在荆川、百川之間，至於發揮經旨，涵泳道德，唐方二家所不及也」⁶¹，二人竟能突然開竅領悟，應歸功於勤能補拙的努力。

戴震是「十歲乃能言，就傅讀書，過目成誦」，其和塾師的一段聰穎對話，一直為後世所稱頌，書曰：

塾師授以〈大學章句〉右經一章，問其師曰：「此何以知為孔子之言，而曾子述之，何以知為曾子之意，而門人記之？」師曰：「此子朱子云爾。」又問：「朱子何時人？」曰：「南宋」又問：「曾子何時人？」曰：「東周」又問：「周去宋幾何時？」曰：「幾二千年」曰：「然則子朱子何以知其然？」師不能答。⁶²

少年時的戴震，讀書能不疑處有疑，以至將來十三經盡通，勤能補拙，終能開竅，此三例皆為後世儒者典範，立志為之，不畫地自限，誠乃篤學之要件。

二、天賦穎悟異常

此類型儒者，天賦則恰為相反，大都年少時聰穎靈敏，有過人之資，博學強記，如精通於小學的錢坫⁶³，精通於《左氏春秋》的馬驥⁶⁴、李鍾泗⁶⁵，精通於《毛詩》、三《禮》的顧九苞⁶⁶，以及篤志研究漢儒之學的黃承吉⁶⁷。

而洪亮吉「生六歲而孤，依外家讀書，穎悟異常兒。晚自塾歸，母氏篝燈課讀，機聲軋軋，與書聲相間不斷」⁶⁸，洪母宛如孟母，教兒勤學不怠，無怪乎日

⁶⁰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一，頁 4-5。

⁶¹江藩：《宋學淵源記》附記，頁 34。

⁶²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五，頁 86-87。

⁶³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三，頁 52。

⁶⁴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一，頁 16。

⁶⁵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七，頁 121。

⁶⁶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七，頁 117。

⁶⁷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七，頁 124。

⁶⁸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四，頁 72。

後洪亮吉成爲大儒。錢大昕與邵晉涵、宋鑒皆「生而穎悟，讀書十行俱下，終身不忘」⁶⁹，三人皆被時人目爲神童。

錢大昕曾接受時人考論，「侍御告之巡撫雅蔚文，檄召至院中，試以《周禮》、《文獻通考》兩論，下筆千言，悉中典要，侍御歎爲奇才」⁷⁰，二書曲奧難讀，而精熟至此。而邵晉涵也被喻爲神人，書云：

君嘗預修國史，館中收貯先朝史冊，以數千計。總裁問於某事，答曰：「某冊第幾頁中。」百不失一⁷¹

邵氏對於數千冊的史冊，爛熟於胸，可謂過目不忘，堪稱一代大儒。

顧炎武「生而雙瞳子，中白邊黑，見者異之，讀書一目十行」⁷²，讀萬卷書，行萬里路，「遊歷所至，以二馬二驢載書自隨。至西北阨塞，東南海陬，必呼老兵退卒，謁其曲折，與平日所聞不合，即發書檢勘」⁷³，其所著《天下郡國利病書》由此而來。以上諸人皆不枉其天賦，而發奮致力於學，爲清代儒學增添不少光彩。

而以下六位儒者，皆在年少時，能詩、通經。王鳴盛生而聰敏，「四歲，隨父讀書丹徒學署，目識數百字，縣令馮詠以神童目之」⁷⁴。劉台拱「九歲，作顏子頌，斐然成章，觀者稱爲神童」⁷⁵，二人皆在幼童即顯現出過人之資，王鳴盛四歲即能識數百字，而劉台拱九歲即能爲文，無怪乎被喻爲神童。

惠士奇在「年十二，即能詩，有『柳未成陰夕照多』之句，爲先輩所激賞」，成年後，「嘗與名流宴集，坐中有難之者曰：『聞君熟於史、漢，試爲誦封禪書。』先生朗誦終篇，不遺一字，眾皆驚服」⁷⁶，可見惠士奇聰穎強記，其能無負於與生俱有的天賦，日後加以自身勤學努力，終能治學有成，即使成年後，學識更爲廣博，使人信服。

朱筠在年十三，即能通《七經》，十五歲作詩文，才氣浩瀚，當時老儒皆見

⁶⁹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六，頁 97。

⁷⁰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三，頁 41。

⁷¹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六，頁 98。

⁷²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八，頁 131。

⁷³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八，頁 134。

⁷⁴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三，頁 39。

⁷⁵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七，頁 118。

⁷⁶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二，頁 18。

之咋舌。李文藻亦在同年紀時，「從父遊曹家亭，作記一篇，仿〈赤壁賦〉」⁷⁷，見聞者皆以為神童。紀昀甚至被視為靈物，「少而奇穎，讀書過目不忘，夜坐暗室內，二目爍爍如電光，不燭而能見目，比知識漸開，光即斂矣」⁷⁸，無論是否為訛傳，江藩所書清儒形象，誠乃令人傳誦不已。

江藩師余蕭客亦是自幼聰穎，「年十五，通《五經》，即知氣理空言，無補經術，思讀漢、唐注疏」，然而因家貧無法蓄書，故強記背誦，書云：

詣書棚借《左傳注疏》，匝月讀畢，歸其書。徐姓訝其速，曰：「子讀之熟矣乎？」曰：「然。」徐手翻一帙，使先生背誦，終卷無誤。徐大駭曰：「子奇人也！」贈以《十三經注疏》、《十七史》、《說文解字》、《玉篇》、《廣韻》。於是畢戶肄經史，博覽群書。性癖古籍，聞有異書，必徒步往借，雖僕僕五六十里，不以為勞也。⁷⁹

其刻苦自勵，足為後世之楷模。然由於讀書甚勤，「於是目力虧損，不見一物。有人傳以坐暗室中，目蒙籃布，存想北斗七宿，一年之後，目雖能視，然讀書但能讀大字本而已」⁸⁰，清儒刻苦勵學，罹患目疾，在江藩書中所在多見，像是王鳴盛、邵晉涵、凌廷堪、錢大昕、薛起鳳等大儒，即使視力毀損，亦不改其研經勤學的態度，則清儒篤實好學，風氣既盛，固無愧於前代矣。

三、篤志向學，力學不倦

勤學之例，清儒不在少數，像是惠棟、程晉芳、秦恩復、黃宗羲、彭瓏、彭紹升、程在仁、羅有高、羅有高等人，皆篤志向學，家有藏書萬卷，日夜講誦，自經、史、諸子、百家、雜說，甚至釋、道二藏，皆究心研讀，日後成為大家。

而王昶無論在軍旅從征、家境窘迫之際，依然手不釋卷、誦讀不已。王昶從軍九年，「磨盾之暇，馬上吟詠，穹廬誦讀」⁸¹，無一日偏廢。武億在父母喪後，「廬舍毀圮，架席處洿泥中，誦讀不輟，斯朽木，焚火以禦寒，斧傷指及足，流血殷地」⁸²，終不忘讀書。竇克勤⁸³亦是在饑粥不繼之時，宛如顏回、陶潛讀書依

⁷⁷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六，頁107。

⁷⁸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六，頁94。

⁷⁹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二，頁30-31。

⁸⁰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二，頁31。

⁸¹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四，頁56。

⁸²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四，頁69。

舊，不改其樂。徐復⁸⁴則為讀書，逃至僧寺中，誦讀達旦。

朱澤澐、程登泰⁸⁵、汪光燧⁸⁶即使晚年得疾，亦讀書不輟，朱澤澐更是「猶五更起，觀書，至夜分不倦，疾甚，吟康節詩曰『任經生死心無異，雖隔江湖路不迷』，命家人治後事」⁸⁷，如此遭受病痛折磨，清儒仍勤學不廢，即是到大去前一刻仍手不釋卷，一代之學，堅毅深刻，故有綜覽前代之成就，令人感歎不已。

自孔子以降，孔門弟子乃至一般士儒，一脈相傳，皆能研經誦讀，當作自身志業。而清儒尤以讀書窮理為志業，以儒學傳承為己任，讀書不輟。本節所述儒者讀書樣態，較之前代儒者，其研究學問之精神，實有過之而無不及，而江藩所錄，亦可見其著力所在。

伍、師友交往情景

《禮記·學記》中云：「獨學而無友，則孤陋而寡聞。」⁸⁸清代學人間，其交往相處，更可窺知儒者學問交流之情形，無論是學術傳承或是彼此交相唱和，皆開啓清代學術昌盛之契機。

學者間的彼此唱和，時有所聞，江藩於書中不時地描摹其友朋間交往的情景，如張爾岐、徐頌、顧炎武、劉灼、汪縉等人於學問貢獻是無庸置疑，而「無友不如己者」（《論語·學而》），往來皆為志同道合之人。以下就江藩所錄，列舉如下：

- 1、爾岐閉戶著書，是以並無知者。平生交遊，炎武之外，則長山劉友生、樂安李象先、關中李中孚、王宏撰四人而已。⁸⁹（張爾岐）
- 2、先生老友中來往親密者，錢宮詹大昕、褚部郎寅亮。⁹⁰（徐頌）
- 3、性耿介，絕不與世人交，獨與里中歸莊善，同遊復社，相傳有歸奇顧怪之目……於同時諸君子，雖以苦節推百泉二曲，以經世之學推黎洲，至

⁸³江藩：《宋學淵源記》卷上，頁9-10。

⁸⁴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七，頁119。

⁸⁵江藩：《宋學淵源記》卷下，頁25。

⁸⁶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七，頁120。

⁸⁷江藩：《宋學淵源記》卷下，頁24。

⁸⁸孔穎達疏：《禮記注疏》（《十三經注疏本》台北：藝文出版社，1955年），卷三十六〈學記第十八〉，頁653。

⁸⁹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一，頁15。

⁹⁰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二，頁36。

於論經評史，亦不苟同也。⁹¹（顧炎武）

4、著書之暇，談論惟史孝咸、惲仲升數人而已。⁹²（劉洵）

5、先生落落寡合，往來最密者，尺木居士一人而已。⁹³（汪縉）

而另外如余蕭客、王鳴盛、王昶、洪亮吉、戴震、汪元亮、任大椿、賈田祖、李因篤、彭瓏、謝文游、薛起鳳等人，其自身研究學問之餘，尤喜與同好共同切磋研究，擦出學術亮麗的火花，當時已有美名稱號，於此不憚繁冗，茲錄於下：

1、涓與黃儀子鴻、顧祖禹景范、閻若璩百詩，分郡纂輯，因得博觀《天下郡國書》，又與子鴻輩觀摩相善，而問學益進焉。⁹⁴（胡渭）

2、沈宗伯德潛見其書，折節下交。……直隸總督方恪敏公觀承聞其名，延至保定修《畿輔水利志》。閒遊京師，與朱學士筍河先生、紀文達公昫、胡文恪公高望相友善，咸謂其學在深甯亭林之間。⁹⁵（余蕭客）

3、時沈文愨公德潛以禮部侍郎致仕，海內英雋之士皆出其門下。與王侍郎蘭泉先生、錢少詹大昕、吳內翰企晉，及曹仁虎、趙文哲、黃文蓮相唱和，文愨以不下嘉靖七子。⁹⁶（王鳴盛）

4、在京師時，與朱筍河先生互主騷壇，門人著錄者數百人，有南王北朱之稱。歸田後，往來吳門，賓從益盛，與王西泚、錢竹汀兩先生，艤舟白公堤下，朋簪雜遝，詩酒飛騰，望之者若神仙然。⁹⁷（王昶）

5、入學為附生，與邑黃秀才景仁，為詩歌，相唱和，有時譽，人目為洪黃……家居，與孫君星衍相觀摩，學益進，時人又目為孫洪。⁹⁸（洪亮吉）

6、天台齊侍郎召南讀其書，恨不識其人，江南惠定宇、沈冠雲二徵君，皆引為忘年交。……乾隆二十七年壬午，舉於鄉，策蹇至京師，困於逆旅，人皆以狂生目之，幾不能供饘粥，獲交於錢少詹大昕，稱為天下奇才。……河間紀庶子昫、嘉定王編修鳴盛、青浦王蘭泉先生、大興朱筍

⁹¹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八，頁131-134。

⁹²江藩：《宋學淵源記》卷下，頁13。

⁹³江藩：《宋學淵源記》附記，頁34。

⁹⁴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一，頁12。

⁹⁵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二，頁31。

⁹⁶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三，頁39。

⁹⁷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四，頁59。

⁹⁸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四，頁72。

- 河先生，皆與之定交，從此海內知東原氏矣。⁹⁹（戴震）
- 7、段玉裁與盧學士文弨、紀相國昀、邵學士晉涵、任侍御大椿、洪舍人榜、汪孝廉元亮，皆同志之友而問學焉。¹⁰⁰（段玉裁）
- 8、為諸生時，與同邑侍鷺川朝詩歌唱和，藝林稱之。¹⁰¹（任大椿）
- 9、為諸生時，有文譽，與同郡余古農師、薛香聞師，結詩社於城東，睥睨餘子，不可一世。¹⁰²（汪元亮）
- 10、與陽湖洪稚存、同里李惇、王念孫友善，矜立名節，猛志疾邪云云，蓋力學篤行之士也。¹⁰³（賈田祖）
- 11、與同郡劉君台拱、王君念孫、汪君中友善，力倡古學。¹⁰⁴（李惇）
- 12、時二曲提倡良知，關中人士皆從之遊，二曲與因篤交最密，晚年移家富平，時相過從，各尊所聞，不為同異之說，君子不黨，其二子之謂乎。¹⁰⁵（李因篤）
- 13、結慎交社，始則宋實穎弟兄三人，及尤侗汪琬、吳敬生七人而已，後遠近聞風，入社者不可勝記。¹⁰⁶（彭瓏）
- 14、時寧都易堂九子，星子髻山七子，以文章氣節名。¹⁰⁷（謝文游）
- 15、先生少為長洲縣學生，與余古農師、汪孝廉元亮同學，為古文詩歌，見稱於時。¹⁰⁸（薛起鳳）

由上述二十項介紹中，我們可以看出江書中表述了幾項要點：一是清儒間不僅閉戶研讀經籍，更藉由與友朋交遊，相互切磋學問，使彼此學問因此而相得益彰。二是漢儒與宋儒並非不相往來，而是交往密切，像是張爾岐與李中孚的交往，顧炎武與孫奇逢、李二曲的結交，汪元亮與薛起鳳的交遊，皆不因學問所持觀點互異，而影響彼此的關係。三是學者間共同結社，彼此交相唱和，蔚為一股風氣。因此儘管在學問基礎上，漢、宋學家為捍衛自身立場而疾言厲色、有所爭辯，然而在另一種學術場合中，清儒卻是共同營造出和諧的學術氛圍。

⁹⁹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五，頁 87。

¹⁰⁰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五，頁 91。

¹⁰¹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六，頁 98。

¹⁰²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六，頁 103。

¹⁰³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七，頁 112。

¹⁰⁴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七，頁 112。

¹⁰⁵江藩：《宋學淵源記》卷上，頁 8。

¹⁰⁶江藩：《宋學淵源記》卷下，頁 20。

¹⁰⁷江藩：《宋學淵源記》卷下，頁 18。

¹⁰⁸江藩：《宋學淵源記》卷下，頁 31。

孔子云：「益者三友：友直、友諒、友多聞。」（《論語·季氏》）江藩書中，記錄下學者與友朋間之情誼，可歸納出以下三項特色，一是相互切磋學問，往來密切；二是以德相互共勉，三是以情義相交，堅定誠懇。下文分述之：

一、相互切磋學問

錢大昕精於算學，當其在京師之時，「與同年長洲褚寅亮、金椒吳朗，講明九章算學，及歐羅巴測量弧三角諸法。時禮部尚書大興何翰如，久領欽天監事，精於推步，時來內閣，與先生論李氏、薛氏、梅氏及西人利瑪竇、湯若望、南懷仁諸家之術，翰如遜謝，以爲不及也。」¹⁰⁹錢大昕不僅精於經學，連算學皆能研究如此精準，與其同年之學人及禮部尚書諸人，時相討論切磋，對其望塵莫及。

惠棟自幼篤志向學，父友李紱一見奇之，惠棟常至李氏任所講論文藝，遂與先生爲莫逆之交，李紱認爲其才學連粵中惠門四子皆不及也。¹¹⁰顧炎武與張爾岐友善，顧氏讀其書而爲之作序，手錄一本立於書堂，「嘗與汪琬書，稱爾岐之學，根本先儒，立言簡當，又與友人論師道書，曰：『獨精三禮，卓然經師，吾不如張稷若』」¹¹¹，可見惠棟、顧炎武與友人間，相互切磋爲學，亦能彼此推重，傳爲一時美談。

袁廷禱、程晉芳、朱筠與向璿則喜於筵席、聚會中彼此切磋學問，附庸風雅，袁廷禱¹¹²、程晉芳¹¹³性好客，時招來四方名流、學士，爲文酒之會，詩歌唱和，不絕於耳。一時雋秀曾邀請朱筠與會，書云：

京兆尹武進蔣炳邀劉文定公綸、程文恭公景伊、錢維敏公維城、莊侍郎存與，及其弟學士培因，設筵招先生及文正公飲，試以崑田雙玉歌，詩成，諸公歎賞不絕，於是京師有競爽之日。¹¹⁴

如此政壇、文壇間之交流，遂使朱筠名冠京師。

向璿欲以友輔仁，「爲輔仁會，赴會十有餘人，每月朔一舉，威儀進止，咸

¹⁰⁹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三，頁 41。

¹¹⁰參照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二，頁 22。

¹¹¹參照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一，頁 15。

¹¹²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四，頁 61。

¹¹³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七，頁 111。

¹¹⁴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四，頁 62。

中規矩，里人目以為癡。」¹¹⁵友朋共同切磋學問，值得稱許，然另一人鄧元昌則與友之子引為忘年之交，「宋昌圖以通家子往謁，與之講論大喜曰：『吾小友也』，館昌圖于家，晨夕論學，為日程，言動必記之，互相攷核。」¹¹⁶可見好學出於風氣，朋友相勉，共進於道。

二、以德相互共勉

在師友交往中，時見諸儒性情流露，如：江聲性情耿介，不好榮利，交遊對象如王鳴盛、王蘭泉，世人皆重其品藻¹¹⁷。黃宗羲亦是性情耿直之人，書云：

見歸德侯朝宗，每宴，以妓侑酒，宗羲曰：「朝宗之尊人，尚在獄中，而放誕如此乎？吾輩不言，是損友也。」或曰：「侯生性不耐寂寞」曰：「夫人而不耐寂寞，則亦何所不至耶？」¹¹⁸

即使是好友，黃宗羲亦正義凜然言其瑕疵之處，時人歎為至論。

類似同為友朋抒發逆耳之忠言者，如沈國模，其與山陰祈忠敏友善，「忠每以御史按江東，一日杖殺大僚數人，適國模至，欣然述杖殺人事，國模瞠目視祈曰：『世培亦曾聞曾子曰：『如得其情，則哀矜而勿喜乎！』』後忠敏嘗語人曰：『吾慮囚必念求如是，恐倉卒喜怒過差，負此良友也。』」¹¹⁹此二人皆能在朋友交往間，恪守聖賢遺澤，以此自持，並以此共勉，實為難得。再就是閻若璩不從眾媚俗，書曰：

天性多否少可，詞科五十人中，獨許吳志伊之博覽，徐勝力之強記而已，如李天生謂其杜撰故事，汪純翁謂其私造典禮。所服膺者三人，曰：錢受之、黃太沖、顧甯人；然論受之則曰：「此老《春秋》不足為準」；論太沖則曰：「太沖之徒，麤待訪錄，指其謬訛，不一而足，指摘《日知錄》一卷，見〈潛邱劄記〉中。」¹²⁰

¹¹⁵江藩：《宋學淵源記》卷下，頁25。

¹¹⁶江藩：《宋學淵源記》卷下，頁27。

¹¹⁷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二，頁35。

¹¹⁸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八，頁129。

¹¹⁹江藩：《宋學淵源記》附記，頁29。

¹²⁰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一，頁9。

閻氏高傲，於學自視甚高，然而學術所在，自有其標準，態度可見。

三、以情義相交

孫奇逢與左光斗、魏大中、周順昌友善，然三人遭陷被逮，孫奇逢傾其全力，欲解救之，但可惜最終三人仍死於逆閹之手，遂經紀其喪，歸葬故里¹²¹。而李因篤為朋友兩肋插刀，為解救遭人誣陷之顧炎武，不惜走三千里，泣訴執事者，使顧亭林脫困¹²²，二人對待朋友之義，實令人感動。

李惇亦為朋友之死，放棄功名，竟不入試，書云：

君內性淳篤恂恂退讓，不與人較。然遇友朋患難，則尚義有為，至死不變。久困諸生，以高第將貢於國學，試之前夕，執友賈田祖死，君不入試，親為棺斂，送歸其家。¹²³

此三人能如此對待朋友如手足，為友赴湯蹈火，犧牲個人亦不足惜，堪為後世典範。另一人武億見朋友落寞，不禁流下傷心淚，書曰：

庚子年，陽湖洪亮吉稚存、黃景仁仲則，流寓日下，貧不能歸，偕飲於天橋酒樓。遇君，招之入席，盡數盞後，忽左右顧盼，哭聲大作，樓中飲酒者駭而散去。藩嘗叩之曰：「何為如此？」曰：「幸叨一第，而稚存、仲則寥落不偶，一動念，不覺涕泣隨之矣！」¹²⁴

面對朋友不幸遭遇，流下男兒淚，為其不捨，江藩在此戲劇性地描繪出武億的嚎啕大哭，哭至眾人皆駭去，日後江藩以此事問之，往事依然歷歷細數，可謂真性情之流露。

除了友朋間交相唱和往來，清儒更能時相討論西學之術，俾使中國算學更加精良，甚而連西方學人都望塵莫及。另外清儒不忘以文會友，以友輔仁，學者重視品藻，不從眾媚俗，趨炎附勢，能以德相互共勉。江書中更提及清儒間情誼之可貴，眼見朋友學人慘遭誣陷，不惜傾其所能，前去搭救，皆屬不易之事，而清

¹²¹參照江藩：《宋學淵源記》卷上，頁 2-3。

¹²²參照江藩：《宋學淵源記》卷上，頁 8。

¹²³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七，頁 112。

¹²⁴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四，頁 71。

儒於學術之外，行事為人，亦一稟儒者教範，則其成就固不僅止於學術一端而已。

陸、小結

綜觀上述，我們可以發現：首先，江藩有意突顯出清儒謹守儒門分際的儒士形象，以及其不分漢、宋學者身分，皆能有所著意，如實塑造出清代儒者的典型。在清儒為人處世之行誼方面，其共同特點是「德行」，儒門一脈相傳，經典中諄諄告誡，自古以來儒士們皆以「德」涵養自身，此乃立身處世之大節，終身不得違悖。因此，清儒是承繼儒學精神，並能加以發揚光大，而非僅學術一端而已，立身之大節，爲人之分際，皆有可傳之處，足爲後人效法。

江藩表彰清儒的德行包含忠、孝、節、義、信、仁、愛等，尤其在盡孝道方面是特別著重，誠如前文所言，孝乃是百行之本，清儒能做到此德行，而其他德行便可由此衍發。也正因爲能涵養內在之「德」，也就可以達到「外王」的事業，此部分待下節探討之。

其次，彰顯清儒治學的用心，江藩有突顯出清儒之爲學成就，並非一蹴可幾，無論其天賦高低，治學皆須按部就班，力學不倦。天賦低者，可靠後天刻苦自勵，終有豁然開朗之日；而天賦異秉者，仍須勤學努力，方使爲學更加精進。許多清儒爲學不倦的例子，都在在表述學者能於學術貢獻一己之力，皆須歷經寒窗苦讀艱困爲學過程。

更值得注意的是，清儒間的交往互動頻繁，有理念相合者共同結社，有時相唱和者被封爲美名，也有彼此學派觀點互異，但卻仍彼此往來切磋不輟。也就是漢儒與宋儒在彼此交遊，研究學問上，並非壁壘分明，互不交涉。更由於清代學術環境受到西學東漸，清儒不以此自限，將西學的方法與中國的算學相結合，以迸發學術的火花。由此見得，清代儒學的學術環境是兼容並蓄，複雜而多元，既彼此相互激盪，也能包容不同學術路線以及外來文化。

第二節 清儒之事功

古人所謂事功之學，可稱經濟之學，即今日的政績。¹²⁵而儒家倡導「士志於

¹²⁵本文參照漆永祥先生所謂「事功之學」之定義。文見漆永祥：《江藩與《漢學師承記》研究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6年4月），頁318。

道」(《論語·雍也》),也就是希望儒者致力於「王道」政治理想的實踐,擔負起「平治天下」的大任。

是以儒家入仕是以行道、行仁為目的。故曾子所謂「士不可以不弘毅,任重而道遠。仁以為己任,不亦重乎?死而後已,不亦遠乎?」(《論語·泰伯》)換言之,儒者以行道為己任,責任之重,至死方休。孟子也談到:「君子之事君也,務引其君以當道,志於仁而已」(《孟子·告子下》),清楚說到士人的參政,是為輔佐人君以行正道,推行仁政。

甚至當國家已偏離大道,儒者發現不容於時局時,也要篤守善道,如孔子所言:

篤信好學,守死善道。危邦不入,亂邦不居。天下有道則見,無道則隱。
邦有道,貧且賤焉,恥也;邦無道,富且貴焉,恥也。(《論語·泰伯》)

當然如果時勢有利於行道,君子也應積極參政,以安貧守賤為恥,不過真正為難的是,時勢不利於行道,君子便當退隱,而以謀求富貴為恥。簡言之,士人要「窮則獨善其身,達則兼善天下」,無法為官參政,不等於毫無作為,可以通過其他途徑如講學著書以服務社會¹²⁶。

本節所要探討的是清儒「治國、平天下」之理念,觀察江藩描述清儒在治學之餘,其對國家人民之貢獻,以及諸儒在時代環境變遷下,以何種面貌自處。首先是氣節表彰,對於時代變異下,不事二君,或政局混亂,寧可退隱;其次是對家國的事功,清儒為實現儒家仁政,小則保衛鄉里以安百姓,大則揮軍以抵禦外侮侵略;最後則以政績彪炳,或是在野之聲譽,了解清儒固然重視學問,卻也是所謂國之干城。

在三個層次中,我們可以觀察以下幾個要點:一、儒者與當朝之互動:是忠君護主,抑或是鞠躬盡瘁,死而後已;二、在混亂不明的局勢下,儒者如何自處:是退隱不願同流合汙,抑或是「治愈進,亂亦進»;三、儒者如何實行仁政,藉此檢視儒者是否實現儒家「治國、平天下」的理想。

壹、崇尚氣節

¹²⁶參照吳光:《儒家哲學片論》,頁 229-230。

自古至今，許多志士仁人恪守節操，他們忠於自己的道德信念，堅守高貴品德，展現了「富貴不能淫，貧賤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」的堅定意志與氣概。正是儒者所表現無私無畏，堅持信念，勇於維護國家尊嚴的態度，在生死關頭毫不妥協，不惜犧牲生命，這種崇高的獻身精神，正是儒家所追求的道德理想和精神風貌。

這樣的精神表現在混亂的時局中，當士人領悟到時事之不可為時，「有道則見，無道則隱」（《論語·泰伯》），寧可歸隱山林，講學著述，不啻對家國的另一種貢獻。倘若身陷時局，他們會臨危不亂，奮不顧身，言行一致，始終如一，為實踐自己的道德理想，或維護社會正義而赴湯蹈火，以此守住自己的節操。

一、忠君不事二主

明末，身處家國丕變的有志之士，在易主之後，崇尚氣節，堅持不事二主者有沈彤¹²⁷、黃宗羲¹²⁸、顧炎武、李中孚等人。其中顧炎武甚至幾次欲以死辭謝，書云：

朝廷開明史館，大學士孝感熊公錫履主館事，以書召炎武，答曰：「願以一死謝公。」戊午詞科詔下，諸公爭欲致之，炎武作書與門人之在京師者曰：「刀繩具在，無速我死。」次年，大修明史，諸公又欲薦之，乃貽書葉學士訥庵，請以身殉，得免，或曰：「先生盍亦聽人一薦，薦而不出，其名愈高矣！」笑曰：「此所謂釣名者也。今夫婦人之失所天也，從一而終，之死靡慝，其心豈欲見知於人，若曰盍亦令人強委禽焉，而力拒之，以明吾節，則吾未之聞矣！」¹²⁹

顧氏忠貞不二的決心由此得見，讀書人之氣節更因此明示。而另一人李中孚亦是明末愛國之士，康熙年間，大吏至家欲強迫其出仕，李氏不惜自殘，書曰：

大吏至其家，敦迫之，中孚絕粒六日，至拔刀自刺，大吏駭去，得以疾辭。遂居土室，反扃其戶，不與人通。¹³⁰

¹²⁷ 參照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四，頁 29。

¹²⁸ 參照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八，頁 129。

¹²⁹ 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八，頁 133。

¹³⁰ 江藩：《宋學淵源記》卷上，頁 5。

二人行徑即文天祥之衣帶贊云：「孔曰成仁，孟云取義，讀聖賢書，所學何事？」雖未以身殉國，但堅守氣節，亦是令人十分欽佩。

二、潔身自好

孟子云：「古之人，得志，澤加於民；不得志，修身見於世。窮則獨善其身，達則兼善天下」（《孟子·盡心上》），因此若知時勢不可為時，士人不願出仕，寧可獨善其身，像是孫奇逢、王心敬、應樞謙¹³¹等人即是。提及孫奇逢，書云：

高陽知其賢，將薦之於朝，奇逢知時不可為，自陳願老公車，不敢以他途進。……巡按御史柳寅東、陳蜚交章論薦，朝令敦促，固辭弗應詔。¹³²

可見孫奇逢決定不為官，後率弟子躬耕田園，從事教育，化育英才。

另一人王心敬眼見朝廷為官貪贓枉法，也決定保持距離。書曰：

朱高安督學關中，數造廬請益焉。陝西總督額忒倫、年羹堯，先後上章薦於朝，兩徵不起。羹堯以禮招致幕府，心敬見其所為驕縱不法，避而不見，亦不往謝。¹³³

身為讀書人，決不可能同流合污，正如孟子所云伯夷「聖之清者」及其「治則進，亂則退」。（《孟子·萬章下》），正是體現儒者出處進退的志節。

三、為官廉直有守

此外，身居亂世，堅守氣節，不願同流合汙者尚有洪亮吉、閻循觀、孫景烈¹³⁴等人。其中對於洪亮吉的論述，江書多所著墨：

時教匪充斥，題為征邪教疏，君指陳時事直書無隱。又在師友前論時事，扼腕歎息，皆以為狂，君知不容於時。¹³⁵

¹³¹參照江藩：《宋學淵源記》卷下，頁 18。

¹³²江藩：《宋學淵源記》卷上，頁 3。

¹³³江藩：《宋學淵源記》卷上，頁 5-6。

¹³⁴參照江藩：《宋學淵源記》卷上，頁 11。

¹³⁵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四，頁 73。

後因其直言不諱個性，招致獲罪，發配伊犁，所幸剛正之節，終有昭雪之日，書曰：

五年四月，京師亢旱……上乃念君以直言獲罪，立予釋回。是日，甘霖大沛，御製《得雨詩》紀其事，又製《導言納諫論》：言亮吉原書，無違礙之句，有愛君之誠，實足啟沃朕心，并將其書裝潢成卷，常置座右，以作良規，毋因亮吉獲咎，鉗口不敢復言。¹³⁶

士人忠君愛國之心，雖遭小人妒害，但天理昭彰，亮吉被釋回當天，竟天降甘霖，江藩特書此事，或有為清儒打抱不平，且善人終有報之日。

閻循觀天性正直，一介不取，於朝廷亦不願趨炎附勢，書云：

授考功司主事，持大體，不阿附上官。衙中會食，必四五簋，循觀獨懷餅食之，同僚哂其儉曰：「性能粗糲，非矯強也。」一同年友為外官，遺之金，不受曰：「忝居此職，不敢受，且不可以貧累君也。」未幾，引疾歸。

137

在不願收受賄賂情勢之下，寧可稱病辭去，也不願同流合汙，此乃清儒義行。

綜上所述，清儒謹守「忠君」、「愛國」、「守節」等道德信念。「忠於前朝國君」，即使山河變色，仍不改前朝遺風，無視於清朝皇帝的招覽，寧死不屈。當然，另一方面，為了「忠君愛國」，不惜直言進諫，即使受小人妒害，亦無怨無悔。另外，士人「守其節操」，即使高官厚祿，無動於心，也不願同流合汙，在在顯示清儒狷介形態。

貳、對家國之貢獻

在治理國家，安邦立國，儒家的政治主張是以民為本，也就是做到「仁」的規範。於是倡導「親民」、「愛人」，「愛人」就是修己以安百姓，加強自身的道德

¹³⁶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四，頁73。

¹³⁷江藩：《宋學淵源記》卷上，頁11。

修養，以使所有老百姓得到安樂，所謂「博施於民，而能濟眾」（《論語·雍也》）的理想。

孟子曾說：「樂民之樂者，民亦樂其樂；憂民之憂者，民亦憂其憂。樂以天下，憂以天下，然而不王者，未之有也。」（《孟子·梁惠王下》）范仲淹把「樂以天下，憂以天下」的思想進一步發展為「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後天下之樂而樂」（范仲淹·〈岳陽樓記〉），也就是要超越個人憂樂，以天下人的憂樂為個人的憂樂，如此方能做到與民同心，與民同德，以達到孔子所謂「仁」的實現。

本節即就二個特色論述：一是抵禦外侮侵略，描述儒者在國家危難之際，以家國為己任，奮勇抗敵，以確保國家安定；二是協助鄉里度困，描述儒者在天災人禍之時，挺身而出，破賊消災，以保全鄉里安寧。

一、抵禦外侮

清朝邊境時有不安，當時緬甸未靖，總督雲南將軍府知王昶之學問，遂請以相從，後緬酋長乞降；之後四川吐司為亂，又肆力定四川，終使兩金川蕩平，隨後又平定甘肅回亂¹³⁸。征旅十多年，為國家貢獻一生心力，平定內憂外患，足見儒者其智足以安邦定國。

明末黃宗羲曾為家國之亡而戮力反清，即使最後兵敗無力回天，惟恐禍及家人，變姓埋名，亡命異鄉，但時局靖平之後，返回故里，講學於書院，即使朝廷以豐厚待遇欲招之，黃宗羲仍以母老及老病堅辭不赴，¹³⁹更是清儒津津樂道之事。

另外，顧炎武遭遇國難，母王氏曾謂之曰：「我雖婦人，然受國恩矣！」後王氏於避禍之時，絕食卒，遺言勿事二姓。顧炎武遂避走他鄉，然先後六謁孝陵，隱居華陰，清人欲招之，守節不願受召。¹⁴⁰儒者為國家君主盡忠，宗羲、炎武無愧於天地，即使情勢無可挽回，同樣彰顯儒者應有之志節，無負於讀書人之氣節。

二、協助鄉里

「讀聖賢書，所學何事？」必是將平日所學，造福於百姓人民，清儒多位學者於此同樣有所表現。洪亮吉歸里講學，嘉慶十二年，「常州旱，有司勘不成災，飢民剝樹皮以食，君請當事率紳士捐資賑濟，所活飢民數十萬，邑人至今稱頌不

¹³⁸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四，頁 54-58。

¹³⁹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八，頁 126-129。

¹⁴⁰參照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八，頁 131-133。

衰。」¹⁴¹無獨有偶，任德成居於鄉里，書曰：

勤施濟，置社倉，創鄉塾，濬萬頃江，達之太湖，里中無水患。有司以聞，賜八品服，年饑，煮粥食餓者，鄉人德之。¹⁴²

洪亮吉與任德成皆能德施於民，不辱儒門之教。王朝式於崇禎十年，「浙中大饑，朝式入岷賑粟，全活甚眾，時天下大亂，將走四方，求奇傑之士，謀治安戰守之策」¹⁴³，明末戰亂，朝式不僅力求賑災，亦為時局奔波，無奈時局無可挽回。

另一人孫奇逢，由於明末政局不穩，盜賊四起，書云：

容城被圍，率里人堅守，巡撫上其事，有旨，褒美而已。時李自成已陷秦晉，賊氛甚迫，乃移家之易州五公山中，依之者數百家。奇逢定條約，修武備，暇則講論身心性命之學，遠近慕德，土賊亦相戒勿犯孫先生。¹⁴⁴

此乃所謂團結即是力量，孫奇逢聯合眾人之力，以禦盜匪，於五公山中安身立命，存活數百家人。同樣擁有護民決心的刁包，江藩述其見義勇為，勇過孟賁，書云：

流賊至祁，散家財，結聚千餘人，守且戰，賊卻走。時有二璫督兵，探卒報賊勢張甚，璫怒，謂卒誑語惑軍心，欲斬之，包厲聲曰：「必欲殺此卒，請先殺刁包。」二璫氣索而止。賊去，流民滿野，為茅屋處之，且給以食，有傷痍者，予以藥，存活數百人。山東婦女被難者，不能歸，遣健僕六人護之歸，于其行，敦屬六人保護，八拜而送，六人感泣，盡歸諸其家，無一人失所也。¹⁴⁵

刁包一稟上天好生之德，具有如此悲天憫人之胸，足為一般儒士之範式。同具悲天憫人之劉原淥，率鄉人誓死保衛家園，書曰：

明末，與仲兄某率鄉人壘土為堡，以禦賊。賊至，守堡者多被創死，仲兄

¹⁴¹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四，頁73。

¹⁴²江藩：《宋學淵源記》卷下，頁26。

¹⁴³江藩：《宋學淵源記》附記，頁30。

¹⁴⁴江藩：《宋學淵源記》卷上，頁3。

¹⁴⁵江藩：《宋學淵源記》卷上，頁4。

出關，身中九矢，力戰。原淥從之，發數十矢，矢盡，仲兄麾之去，原淥大呼曰：「離兄一步，非死所。」，乃舉刀斬二渠帥，獲馬六匹，賊遁去，亂定。……又為鄉人置義倉，歉歲煮粥以食饑人，嘗曰：「人與我一天而已，何畛域之有焉。」¹⁴⁶

不僅能護衛鄉土，更懂得未雨綢繆，為鄉人設義倉，如此民胞物與精神，當與天地同在。

而張沐則用聖賢之學，教化人民，江藩論道：「除直隸內黃縣，敦教化，重農事，注六諭敷言，反覆譬喻，雖婦孺聞之，亦憬然改過也。朔望集諸生，講學明倫堂，勉以聖賢之道。」¹⁴⁷以己身之學，貢獻於民，為官自能清廉，以德教化百姓，正所謂「里仁為美」。無獨有偶，江永為人和易近人，「處里黨，以孝悌仁讓為先，人多化之。嘗援《春秋傳》豐年補敗之義，勸鄉人輸穀立義倉，行之三十年，一鄉之人，不知有饑饉云。」¹⁴⁸江永運用史傳之法以教鄉里，當所謂學貴於行，符合儒門教化之最終目標。

儒者對家國的貢獻不勝枚舉，眼見國家陷入危急之際，拿出壯士斷腕之勇氣，揭竿而起，為民族國家而奮鬥，不惜犧牲生命，也要奮力一戰。見鄉民身陷水深火熱之中，更有「人飢己飢，人溺己溺」之胸懷，共同抵禦盜賊，救助飢荒，俾使人民能安身立命。儒者之義行，當不辱儒家「仁民愛物」的經世思想。

參、廉能有為

清儒之所以能深受人民愛戴，以及皇帝青睞，在於其為官清廉，以及為學廣博豐厚，本節將從以下兩個特色分述之：一、任官清廉贏得民心；二、學問淹博深受朝廷信賴。

一、任官清廉贏得民心

身為朝野官員，當不辱使命，為黎民百姓造福，江書中提及武億、彭瓏、李文藻¹⁴⁹、韓夢周¹⁵⁰四人皆有政績，深得民心，其中論及武億：

¹⁴⁶江藩：《宋學淵源記》卷上，頁10。

¹⁴⁷江藩：《宋學淵源記》卷上，頁9。

¹⁴⁸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五，頁78。

¹⁴⁹參照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七，頁107。

¹⁵⁰參照江藩：《宋學淵源記》卷上，頁11。

選山東博山縣，訟無留牘，禱雨即降，有人賄以二千金者，「汝不聞雷聲乎？我懼雷擊我也。」暇日，召耆老，問土俗利病，革除民供煤炭，及饋里馬草豆諸秕政。¹⁵¹

其不僅清廉，且能為百姓上奏請命，免除擾民之土貢。又於乾隆年間，遭和珅誣陷罷官，「民間令去，扶老攜幼，數千人走省中，見大府，叩首，乞留我好官」¹⁵²，然可惜，嘉慶四年，天子親政後，欲起用廢官者，當時武億已死，令人不勝唏噓，但廉能有守之風範，仍是令人景仰。

無獨有偶，彭瓏亦遭此命運捉弄，或許江藩有意為二人平反，以昭後人垂念，書云：

選惠州長寧縣，縣城在山中，僅五里。前假令貪而酷，民甚苦。瓏至，去苛政，與民休息。自書楹柱云：「厥田下下，惟願減賦輕徭，汔五都之小息，自我居居，庶幾飲冰茹蘗，偕百姓以長寧。」數月後，訟簡民安，訟庭稀鞭扑聲。以廉直忤知府，又與前假令有隙，乃合謀誣陷，遂罷官歸。¹⁵³

奈何為官正直，為百姓謀福祉之儒士，命竟多乖，落得此下場。

其他任官清廉者，鄉里人深為感念如惠士奇，書云：

在任遷右春坊右中允，超擢侍講學士，轉士讀學士。丙午，任滿還都，送行者如堵牆。既去，粵人設木主配食先賢，廣州於三賢祠、惠州於東坡祠、潮州於昌黎祠。元旦及生日，諸生肅衣冠入拜，其得士心如此。¹⁵⁴

任官能如此，不枉儒門之訓誡，為官當能兼善天下。另外，馬驥亦是深得民心，在任過世後，「士民皆哭，且號於上曰：『願世世奉祀，於是得部檄祠名宦。』」

¹⁵⁵

另一人宋鑿為官十多年，以廉能不斷晉升，書云：

¹⁵¹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四，頁 69。

¹⁵²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四，頁 70。

¹⁵³江藩：《宋學淵源記》卷下，頁 20。

¹⁵⁴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二，頁 19。

¹⁵⁵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一，頁 16。

銓授浙江常山縣知縣，三年調鄞縣，蒞鄞七年，以廉能廣東南雄府通判，署連州，又署澳門同知，又署潮陽縣，所至有政聲，士民立生祠，頌遺愛焉。以親老告歸，囊無長物，攜書數千卷而已。¹⁵⁶

宋鑒為官清廉，人們為他立生祠，最後兩袖清風告歸，令人感佩，儒者盡心於黎民百姓身上，贏得民心，堪為後世表率。

二、學識淹博深受朝廷信賴

清朝立國後，除了尊奉程朱理學為基本國策，還承認儒經的合法地位，康熙隨即開設博學鴻詞科，以網羅漢族名士，一時朱彝尊、毛奇齡等經學家紛紛入選。乾隆十五年，漢學先驅顧棟高對《春秋左氏傳》的研究，被乾隆讚揚為「積學之士」¹⁵⁷，授為國子監司業。而惠棟也以博通經史，學有淵源，被列名薦牘，對此惠棟稱為「國家兩舉制科，猶是詞章之選，近乃專及經術，此漢、魏、六朝、唐宋以來所未行之曠典。」¹⁵⁸此無異是表明惠棟對當時朝廷提倡經學之熱烈回應。

同時乾隆又開四庫館，以整理蒐羅古典文獻，鼓勵和支持經學研究，戴震首以布衣入翰林，一時上自名公巨儒，如紀昀奉命辦理四庫全書；下至博士學究，無不以考訂經籍為己任。而錢大昕則是「即命入直上書房，授皇十二子書，又奉敕修《熱河志》、《續文獻通考》、《續通志》、《一統志》、《天毬圖》，皆預纂修之列」¹⁵⁹，朝廷唯才是用，儒者博通經籍，爛熟故事，正可以備顧問，提供一代典制規章。而清儒用心學術，學有專精，更可為國效力。

陳厚耀深受皇帝器重，早年受教於梅文鼎，皇上也多次與其交相問難，書云：

召至西煖閣，詢問家世甚詳，從至熱河，命賦泉源石壁詩，授中書科中書，傳旨曰：「汝知陳厚耀否？他算法近日精進，向曾受教於汝祖，今汝祖若在，尚將就正於彼矣！」乃命厚耀、穀成並修書於蒙養齋，賜《算法原本》、《算法纂要》、《同文算指》、《嘉量算指》、《幾何原本》、《周易折

¹⁵⁶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一，頁11。

¹⁵⁷《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》，卷三九六「乾隆十六年八月丙申」（台北：華聯出版社，1964年1月），第八冊，頁3。

¹⁵⁸惠棟：〈上制軍尹元長先生書〉，《松崖文鈔》卷一，收錄於《東吳三惠詩文集》（台北：中研院文哲所，2006年5月），頁314-315。

¹⁵⁹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三，頁41。

中》、字典、西洋儀器、金扇松花石硯及瓜果等。克什癸巳，書成，特授翰林院編修。甲午，丁內艱，命賜帑銀，著江蘇織造經紀其喪。¹⁶⁰

陳氏為學廣博，研究算學不遺餘力，而清儒訓詁名物，歷算天文，皆所爛習，尤其就教於西學外人，可謂中、西學之交流，學術求廣，於此可見。

因此深受君主青睞者，多為學問淵博，或為官政績特出，如閻若璩、戴震、王昶¹⁶¹、朱筠¹⁶²、江永¹⁶³、王心敬、竇克勤等人。其中閻若璩深受雍正敬重，書云：

世宗在潛邸，手書延至京師，握手賜坐，呼先生而不名。索觀所著書，每進一篇，未嘗不稱善。疾亟，請移就外，留之，不可，乃以大床為輿，上施青紗帳，二十人舁之出，移居城外十五里，如臥牀簣，不覺其行也。卒年六十有九，時康熙四十三年六月八日，世宗遣官經紀其喪，親製輓詩四章，有「三千里路為余來」之句，後為文以祭之，有云：「讀書等身，一字無假，孔思周情，旨深言大。」若璩以諸生而受聖主特達之知，可謂得稽古之榮矣！¹⁶⁴

閻氏能受君主如此看重，由祭文中四句「讀書等身，一字無假，孔思周情，旨深言大」不難看出，皇上對學問之鍾愛，因而對碩儒如此器重，甚至為其處理後事，可見清代學風，亦有帝王獎掖之助。而另一人戴震，在逝世後十餘年，皇上提及「戴震尚在否？」左右大臣回答已死，皇上歎惜良久¹⁶⁵，此二例皆是皇帝對漢學家治學之讚嘆。

其實宋學家亦深受皇帝器重，竇克勤是其中一例：

克勤書學宗孔孟，治法堯舜，而其要在慎獨十四字以進，聖祖覽而器之。

¹⁶⁶

康熙對竇氏道德學問之倚重，而另一人王心敬¹⁶⁷亦深受雍正器重，朝野知之。另

¹⁶⁰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七，頁 110。

¹⁶¹參照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四，頁 54-60。

¹⁶²參照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四，頁 62-63。

¹⁶³參照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五，頁 79。

¹⁶⁴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一，頁 8。

¹⁶⁵參照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五，頁 91。

¹⁶⁶江藩：《宋學淵源記》卷上，頁 10。

¹⁶⁷參照江藩：《宋學淵源記》卷上，頁 6。

外，從中不難發現，在清代帝王心中，學問並無特定立場，像是雍正同樣對於漢學家的閻若璩，及宋學家的王心敬，皆讚嘆欣賞，其看重者乃儒者為學之精神。

綜上所述，清儒為官謹守節操，「憂以天下，樂以天下」，為民造福，與民休息，並且清廉自持，一介不取，如此「民胞物與」精神，贏得民心愛戴，無怪乎卸職離去之時，鄉民感念其澤而立祠，另一方面由於學問淹通也深受君王青睞與器重，儒者為邦國柱石，於此可見。

肆、小結

綜合本節論述，可以歸納以下幾個要點：首先，與當朝者的互動因身分有異，一派是明朝遺老，如黃宗羲、顧炎武、李中孚等人，當初皆為反清復明有志之士，謹守節操，絕不受清廷的威脅利誘。另外，也有與當政者往來密切，像是紀昀、閻若璩等人，學識豐厚與君王彼此論學，但也有學者拒絕與政事俗事有所交涉，而不願為官，出處固然不同，但卻一稟其學，恪守其位，為家國、為鄉里留下典型。

其次，在混亂不明的局勢下，清儒有三種作為：一是像孫奇逢、王心敬等人「有道則見，無道則隱」，既然時不我予，也就慨然不戀棧，歸隱事親。二是像洪亮吉、閻循觀等人「任官亦不改其志」，即使在時局不明之時，仍不改其節操，不願同流合汙，上書直陳時勢之弊，得罪奸佞之人，以致獲罪。三是像刁包、劉原淥等人堅守崗位為民造福，身為地方官者，仍直道無悔為人民消災解厄，解除百姓繁冗的徵賦，平定盜賊，救助人民免於飢荒天災。

主要因為清儒以實行「仁政」為其最高理想，治學嚴謹，考究名物，移於治民處世，同樣一絲不苟，但根源所在，儒者之稟性與操守，更是成為一代之儒的要件，也是令人感佩之處。因此，清儒以「仁民愛物」、「愛民親民」作為施政的具體要務，若能操守廉節，更能深受人民愛戴，像是惠士奇、馬驥等人，百姓感念其恩德，紛紛為其立祠。由此可知清儒對於家國之貢獻是無庸置疑的，遵行儒家政治道德以行之，是為家國、人民之福，而江藩所述，無疑也指出儒學固然有旨趣之異，卻也有終極核心之同，學問多方，但立身行道，卻無有不同。儒之大有用於國，於此可知。

第三節 清儒之治學成就

誠如第二章所言，清代儒學學術多元，就儒門學術領域而言，漢學家重考據；宋學家重義理闡發，二者因其不同學術路徑，而有不同學術成果，但江藩於其敘述中，特別留意其學術成果的呈現。本節將分作兩個不同層次探討：一是從江藩書中，歸納清儒在各個學術領域中成果之呈現，在經學領域、史學領域、其他類項領域中，學術成就為何？另外，從學者間彼此執經交相問難，所各自提出對學術的不同觀點，以及對經籍的不同詮釋，呈現出彼此理念有何異同。

在這兩個層次中，我們將可檢視以下幾個要點：一、漢儒與宋儒之學術成就有何差異？二、清儒之學術成就是源於個人創發，抑或是承繼前人研究成果，並加以發揚？三、清儒間之交相問難，是否有助於學問之增進，而此亦是江藩書中所特別彰顯之處。

壹、清儒學術成就的面向

本節將從清儒的經學成就、史學成就、其他類學成就三方面來呈現清儒之研究成果。在經學成就方面，分別就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易》、《禮》、《春秋》、小學、金石文字等不同領域，依學者之專長及嗜好，以呈現出清儒經學成就的方向。在史學成就方面，則分別就史學、輿地、天文歷算三個領域，逐項呈現其研究精神及豐碩成果。在其他類學成就方面，則分別就詩詞文章、律呂等二個領域，突顯出清儒在研經讀史之餘，亦在此二領域凸出的成就。

一、清儒經學成就

1、《易》

梁啓超言清代之《易》學，初在打破宋明以來之異說，其云：

清代《易》學，第一期工作，專在革周、邵派的命。黃梨洲的《易學象數論》，首放一矢，其弟黃晦木（宗炎）著《圖書辨惑》，把濂溪《太極圖說》的娘家——即陳搏自稱從累代道士傳來的《無極圖》——找出來了……胡舛明著《易圖明辨》，引證詳博，把所有一切怪誕的圖……一概打掃得乾乾淨淨。一千年蒙罩住《易經》的雲霧算是開光了，這不能不說是清初

學者的功勞。¹⁶⁸

此說與江藩見解不謀而合，江藩在《經師經義目錄》言：「國初老儒，亦有攻王弼之注，擊陳搏之圖者，如黃宗羲之《易學象數論》，雖闢陳搏、康節之學，而以納甲動爻爲僞象。又稱王輔嗣注簡當無浮義，黃宗炎之《周易象辭圖書辨惑》，亦力闢宋人圖書之說，可謂不遺餘力矣。」¹⁶⁹清初學者對於宋明以來之異說，可謂已徹底破解，而爲《易》學撥雲見日，開闢一正途。故江藩又云：「蓋《易》自王輔嗣、韓康伯之書行，二千餘年，無人發明漢時師說，及東吳惠氏起而導其源，疏其流，於是三聖之《易》昌明於世，豈非千秋復旦哉！」¹⁷⁰極力頌讚其先師惠棟於《易》學之功。

而惠棟精研《易》經三十年，觸類旁通，方能深得其旨，於是撰《周易述》，江藩稱其書「專宗虞仲翔，參以荀鄭諸家之義，約其旨爲注，演其說爲疏，漢學之絕者千有五百餘年，至是粲然復章矣！」¹⁷¹惠棟固然有其功績，然梁啓超提出持平之論，云：「同爲漢儒，而傳授淵源不同，彼此矛盾的地方便不少，定宇統而名之曰：『漢學』……定宇說的不過東漢末年鄭康成、荀慈明、虞仲翔等幾個人之學，頂多可以代表一兩派，而且各人所代表的派也不能相通。」¹⁷²故惠氏將鄭康成、荀慈明、虞仲翔三人之學，視爲漢學，實屬不當。

江藩書中亦提及惠士奇論《易》時說：「《易》始於伏羲，盛於文王，大備於孔子，而其說猶存於漢……王弼盡改爲俗書，又創爲虛象之說，遂舉漢學而空之，而古學亡矣。《易》者象也，聖人觀象而繫辭，君子觀象而玩辭，六十四卦皆實象，安得虛哉！」¹⁷³惠士奇論《易》甚有見地，認爲漢以後各家之說，已有所偏頗，實應以文王、孔子之精神言《易》。清儒尚有多位大儒「尤邃於《易》」者，如：王昶¹⁷⁴、紀昀¹⁷⁵、費士璣¹⁷⁶等，皆有辨正《易》學之功。

2、《書》

¹⁶⁸梁啓超：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》（台北：正大出版社，1974年10月），頁250。

¹⁶⁹江藩：《經師經義目錄》，收錄於《漢學師承記》（台北：台灣商務印書館，1965年2月），頁138。

¹⁷⁰江藩：《經師經義目錄》，頁138。

¹⁷¹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二，頁23。

¹⁷²梁啓超：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》，頁252。

¹⁷³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二，頁19-20。

¹⁷⁴參照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四，頁59。

¹⁷⁵參照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六，頁95。

¹⁷⁶參照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三，頁40。

《尚書》之真偽，自朱子以來，開始有所懷疑，直至清代方有所辨明。江藩在《經師經義目錄》言《尚書》之真偽，云：

至唐，孔穎達為《正義》，取偽孔書……，反斥鄭氏所述之二十四篇為張霸偽造，霸偽造者，乃百兩篇……，自此以後，《正義》大行，而馬鄭之注皆亡。至宋，吳棫、朱子始疑其偽，繼之者吳草蘆、郝京山、梅鷟也，然皆未能抉其奧，探其蘊。逮國朝閻氏、惠氏出，而偽古文寢微，馬、鄭之學復顯於世！¹⁷⁷

故清初學者已將《尚書》之真偽辨出，梁啟超稱此事為「清儒在學術史上極有價值的事業」¹⁷⁸。

閻若璩在二十歲時讀《尚書》，受到黃宗羲《授書隨筆》的啓迪，就懷疑二十五篇是偽作，於是潛心研究二十多年，「乃盡得其癥結所在，作《古文尚書疏證》」¹⁷⁹。惠棟有《古文尚書考》二卷，認為「孔壁中古文得多十六篇，內有九共九篇，析之為二十四篇，鄭康成所傳之二十四篇，即孔壁真古文。」¹⁸⁰

江聲讀惠氏《古文尚書考》及閻若璩《古文疏證》後，方知「古文及孔傳皆晉時人偽作」¹⁸¹，於是集漢儒之說，旁徵他書，鑽研訓詁，而成《尚書集註音疏》十二卷。王鳴盛與惠棟共講經義，王氏亦精研《尚書》，「乃信東晉之古文固偽，而馬鄭所注，實孔壁之古文也。東晉所獻之〈大誓〉固偽，而唐人所斥為偽〈大誓〉者，實非偽也。古文之真偽辨，而《尚書》二十九篇粲然具在。」¹⁸²梁啟超對江聲、王鳴盛二人之成就予以認同，其云：「所用方法大致相同，都是拿《史記》、《尚書大傳》當底本，再把唐以前各種子書及箋注類的書，以至《太平御覽》以前之各種類書，凡有徵引漢儒解釋《尚書》之文慢慢搜集起來，分綴每篇、每句之下，成為一部漢儒的新注」¹⁸³，江、王二人信從的是惠氏經說，所以同樣宗主漢學。

胡渭在習讀《尚書禹貢》時，認為是偽作，於是「博稽載籍及古今注釋，考

¹⁷⁷江藩：《經師經義目錄》，頁 140。

¹⁷⁸梁啟超：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》，頁 255。

¹⁷⁹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一，頁 5。

¹⁸⁰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二，頁 26。

¹⁸¹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二，頁 33。

¹⁸²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三，頁 39。

¹⁸³梁啟超：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》，頁 256。

其同異而折中之，依經立解，章別句從，成《禹貢錐指》二十卷¹⁸⁴，《尚書》中單篇屬《禹貢》最複雜，故梁啓超深加稱許，「是爲清代研究古地理之首」、「創始之勞，應該紀念」¹⁸⁵。上述諸儒在研讀《尚書》數十年後，皆能信古疑古，考辨其真偽，其治經之精神，當爲後世模範，而遺留之著作皆爲粲然巨著，也是清儒最具代表性之成就。

3、《詩》

梁啓超先生認爲：「清儒在《詩》學上最大的功勞，在解釋訓詁名物。」¹⁸⁶因此，江藩在《經師經義目錄》中云：「國朝崇尚實學，稽古之士崛起，……鶴齡（朱鶴齡）與同里陳啓源樞《毛詩》，啓源又著《稽古編》三十卷。惠徵君定宇亟稱之，其書雖宗鄭學，訓詁聲音，以《爾雅》爲主，草木蟲魚，以《陸疏》爲則，可謂專門名家矣！」¹⁸⁷朱鶴齡與陳啓源之作，可算是當時名著。清儒對於《詩》經之貢獻在於訓詁考物，戴震亦曰：「就全《詩》考其名物字義於各章之下，不以作《詩》之意衍其說。蓋名物字義，前人或失之者，可以詳覈而知。古籍具在，有明證也。作《詩》之意，前人或失之者，非論其世，知其人，固難以臆見定也。」¹⁸⁸戴氏一語，道盡清儒在《詩》學上之貢獻。

江藩書中謂錢大昕不專治一經，而無經不通，其論《詩》尤有見地，謂：「《毛傳》多轉音，古人音隨義轉，故字或數音……顧亭林泥於一字祇有一音，遂謂詩有無韻之句，是不然矣！」¹⁸⁹此外，李惇治經通敏，同樣「尤深於《詩》」¹⁹⁰皆可見清儒治學之趣味與成就所在。

4、《三禮》

清代學者對於《禮》之研究甚爲關注，其中以《儀禮》成就最大。清儒最初治《儀禮》者爲張爾岐，讀《儀禮》時感歎道：「學者不能尋其端緒，乃取經與注章分之，定其句讀，疏其節，錄其要，取其明注而止。有疑義，則以意斷之，亦附於末，始名《儀禮鄭注節釋》，後改名《儀禮鄭注句讀》」¹⁹¹，顧炎武稱其

¹⁸⁴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一，頁12。

¹⁸⁵梁啓超：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》，頁257。

¹⁸⁶梁啓超：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》，頁258。

¹⁸⁷江藩：《經師經義目錄》，頁142。

¹⁸⁸戴震：《毛詩補傳·序》，收錄於《戴震全書》第一冊（合肥：黃山書社，1994年7月），頁125-126。

¹⁸⁹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三，頁45。

¹⁹⁰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七，頁113。

¹⁹¹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一，頁15。

「獨精《三禮》，卓然經師」¹⁹²也。

由此可知，《儀禮》患其難讀，故清儒在潛心研讀之後，皆能有所著述，以爲後人采擇，無獨有偶，沈彤亦有相同困擾，故其「以康成公彥爲宗，兼采元敖繼公之注……彤述作矜慎，不輕意下筆，所著如《尚書小疏》僅數十則……傳於世者，《周官祿田考》、《儀禮小疏》」¹⁹³。另一人褚寅亮究心《禮經》，長達三十年，曾談到：「宋人說經，好爲新說，棄古注如土苴，惟《儀禮》一書爲樸學，空談義理者不能措辭……著《儀禮管見》四卷」¹⁹⁴，褚寅亮認爲《儀禮》一書，必須要以樸學爲基礎來研讀，無法讓有心巧立新說者爲之。清儒能將極難讀之《儀禮》變成人人可讀，可謂功勞甚大。

惠士奇在論《周禮》時，有其見解，其曰：「夫漢遠於周，而唐又遠於漢，宜其說之不能盡通也，況宋以後乎？周秦諸子，其文雖不盡雅馴，然皆可引爲《禮經》之證，以其近古也。」¹⁹⁵故惠氏說法，信古爲真，乃是有其辨證之思惟。

金榜專治《三禮》，研經時「以高密爲宗，不敢雜以後人之說」¹⁹⁶，實是謹守師法之儒者。而沈彤因喪禮久廢，輯《士喪禮說》¹⁹⁷，此外同樣究心於《禮經》者尚有：江永¹⁹⁸、金日追¹⁹⁹、孔繼涵²⁰⁰等人。

5、《春秋》

《春秋》爲孔子正名之作，文約旨遠，惟藉《傳》以明其意，故惠士奇論《春秋》曰：「《春秋》三傳，事莫詳於《左氏》，論莫正於《穀梁》……吾恐三傳廢而《春秋》亦隨之亡也。左氏最有功於《春秋》，公穀有功兼有過，學者信其所必不可信，疑其所必無可疑，惑之甚者也。」²⁰¹惠氏在此言明後人讀《春秋》時必有之態度。

而惠棟於《春秋》傳有《左傳補注》六卷，序中論道：「嘗見鄭康成之《周禮》，韋宏嗣之《國語》，純采先儒之說，未乃下以己意，令學者審其異同……今則取經傳，附以先世遺文，宗韋鄭之遺，前修不揜，效樂劉之意，有失必規，

¹⁹²顧炎武：《亭林詩文集》卷六〈廣師〉（台北：中華書局，1970年6月），頁13。

¹⁹³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二，頁29。

¹⁹⁴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二，頁36。

¹⁹⁵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二，頁20。

¹⁹⁶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五，頁79。

¹⁹⁷參照江藩：《宋學淵源記》卷下，頁17。

¹⁹⁸參照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五，頁76。

¹⁹⁹參照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三，頁40。

²⁰⁰參照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六，頁107。

²⁰¹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二，頁20。

而於古今文之同異，辨之尤悉云。」²⁰²惠棟對《春秋》之貢獻，在於宗前人之遺文，有訛誤即規正，並加以辨正古今文。

錢大昕在讀《春秋》時，其心得是「孟子言：『孔子成《春秋》，而亂臣賊子懼』愚嘗疑之……聖人修《春秋》，述王道以戒後世，俾其君為有道之君：正心、修身、齊家、治國，各得其所，又何亂臣賊子之有？若夫篡弑已成，據事而書之，長史之職耳，非所謂其義則竊取之者也。秦漢以後，亂賊不絕於史，由上之人無以《春秋》之義見諸行事故爾，故曰：惟孟子能知《春秋》。」²⁰³錢氏本對孟子之言有所疑惑，然而後由歷代諸多例證，史冊對亂臣賊子皆有所載，以此對於朝廷國君，所能收警惕之效，確實可以抑止悖亂之心，因此說孟子最能深解《春秋》之意。

錢塘晚年讀《春秋左氏經傳》，潛心有得，「作古義若干卷，以補杜氏之闕，且糾其謬，其所作古文曰《述古編》四卷」²⁰⁴。馬驢尤其癖好《左氏春秋》，其治經「以敘事易編年，引端竟緒，條貫如一傳，謂之《左傳事緯》」，當時稱美他為「馬三代」，後顧炎武讀其書，感嘆道：「必傳之作也」²⁰⁵。另一人李鍾泗亦長於《左氏春秋》，「撰《規規過》一書，抑劉伸杜」²⁰⁶，焦循稱讚其書「精妙詳博」²⁰⁷，皆可見其治學之功。

褚寅亮早年為公羊何休之學，撰《公羊釋例》三十卷，其主張：「三傳惟《公羊》為漢學，孔子作《春秋》，本為後王制作，訾議公羊者實違經旨，又因何邵公言禮有殷制，有時王之制，與《周禮》不同，作《周禮公羊異義》二卷」²⁰⁸。此外，同樣究心於《春秋》者有：錢塘²⁰⁹、劉逢祿²¹⁰、李惇²¹¹等人。

6、小學

清代漢學家特別在經籍的訓詁考據著力最深，成就也最為可觀，梁啟超對清儒小學成就，曾有如是讚揚：

²⁰²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二，頁 26。

²⁰³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三，頁 47。

²⁰⁴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三，頁 49-50。

²⁰⁵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一，頁 16。

²⁰⁶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七，頁 121。

²⁰⁷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七，頁 121。

²⁰⁸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二，頁 37。

²⁰⁹參照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三，頁 51。

²¹⁰參照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四，頁 75。

²¹¹參照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七，頁 112。

小學本經學附庸，音韻學又小學附庸，但清儒向這方面用力最勤，久已「蔚為大國」了。方纔說，他們最大的貢獻在訓詁，他們為什麼能有這種貢獻？就因為小學、音韻學成為專門之業。²¹²

清儒在治經態度上，的確值得後世學習，像是閻若璩「平生長於考證，遇有疑義，反覆窮究，必得其解乃已」²¹³，戴震其學亦長於考辨，「立一義，初若創獲，及參互考之，確不可易」²¹⁴。二人究心學問態度，絕不馬虎，必須反覆參互考究，方可罷休。

江聲亦精於小學，以許慎《說文解字》為宗，而《說文》所無之字，必尋求假借字取代之。曾著作《六書說》一首，其說「轉注以五百四十部為建類一首，以凡某之屬皆從某為同意相受」²¹⁵，江藩譽為「實前人所未發」，可見得江聲對小學之創見。同樣究心小學的有張弼，其著《婁機漢隸字原校本》，序曰：「今悉準之《說文》，於漢隸字原中取一正體，以朱體標出之，或破體而不至背正體者，亦標出之。其雖無當於正體而近是者，亦點出之，其全偽者，則據《說文》駁正之，其本碑不誤，而字原抄寫致錯者，亦校正之。」²¹⁶張弼對於篆書變為隸書，各家碑版字體不一，藉此書以校正訛誤，貢獻實大。

吳玉搢亦考證古書文字之異同，「取字體之假借通用者，系韻編次，各注所出，為之辨證，著《別雅》五卷」²¹⁷。宋鑿亦深於小學，「以潛邱《古文尚書疏證》文詞曼衍而不爾雅，重輯《尚書考辨》四卷，嘗曰：經義不明，小學不講也。小學不講，則形聲莫辨，而訓詁無據矣！」²¹⁸宋鑿對文字考證之講究，正道出清儒治經何以先講求聲音訓詁的道理。

余蕭客能於弱冠之齡，即能發現「郭璞注《爾雅》用舊注而掩其名，謂之攘善無恥，乃採《注疏》及《太平御覽》諸書中犍為舍人、孫炎、李巡舊注，而為之釋，書未成，先成《注雅別鈔》八卷。專攻陸佃《新義》、《埤雅》，及羅願《爾雅翼》之誤，兼及蔡卞《毛詩名物解》」²¹⁹後沈德潛見了此書，大為讚嘆，折節下交。

²¹²梁啟超：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》，頁 287-288。

²¹³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一，頁 8。

²¹⁴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五，頁 87。

²¹⁵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二，頁 35。

²¹⁶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一，頁 9。

²¹⁷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一，頁 10。

²¹⁸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一，頁 11。

²¹⁹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二，頁 31。

清代多位儒者在小學方面成就甚大，諸如：汪中於文字訓詁、制度名物，「有係於學者，分別部居，為《述學》一書」²²⁰；朱筠重刻許氏《說文解字》²²¹；李威著有《說文解字定本》十五卷²²²；王念孫精於訓詁，著有《廣雅疏證》十卷²²³；高愈著有《朱子小學注》，頒行於學官，使諸生習之²²⁴；羅有高為訓詁之學有《釋蠹》一篇²²⁵。而在治經深於小學者尚有：錢塘²²⁶、李賡芸²²⁷、袁廷燾²²⁸、莊忻²²⁹、段玉裁²³⁰、桂馥²³¹、程晉芳²³²、江德量²³³、汪喜孫²³⁴、秦敦夫²³⁵等人，皆為名家，清儒學術之特色與專長，於此可見。

7、金石文字

清儒雅好金石文字者所在多有，傾其之力蒐集碑拓，像是張弼「遇荒村野寺，古碑殘碣，埋沒榛莽之中者，靡不椎拓。嘗登焦山，乘江潮歸壑，往山巖之下，藉落葉而坐，仰讀《瘞鶴銘》，聚四石，繪為圖，聯以宋人補刻字，證為顧況書，援據甚核，力臣書法唐賢，世稱能品。」²³⁶張氏不僅以書法聞名，苦心收集碑版文字，考證出《瘞鶴銘》為顧況書，更足證其學養豐富。

武億考訂秦漢以來金石文字，好友童鈺喜好收藏碑版，「童君服其精審，於是酷嗜翠墨。遊歷所至，如嵩山、泰岱，遇有石刻，捫苔剔蘚，盡心摸拓。或不能施氈椎者，必手錄一本。偃師杏園莊，去所居四十餘里，民家掘井，得晉劉韜墓誌，長二尺有餘，重幾百斤，君肩之以歸。」²³⁷即使離鄉甚遠之碑石，武億仍不辭勞苦，將重達百斤之墓碑扛回收藏，皆可見清人學術信念之深厚。

而另一人李文藻亦是性好碑版文字，凡遊歷所到之處，必細心蒐集，甚至帶

²²⁰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七，頁 115。

²²¹參照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四，頁 63。

²²²參照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四，頁 69。

²²³參照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五，頁 91。

²²⁴參照江藩：《宋學淵源記》卷下，頁 21。

²²⁵參照江藩：《宋學淵源記》附記，頁 32。

²²⁶參照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三，頁 51。

²²⁷參照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三，頁 40。

²²⁸參照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四，頁 61。

²²⁹參照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四，頁 74。

²³⁰參照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五，頁 91。

²³¹參照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六，頁 108。

²³²參照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七，頁 112。

²³³參照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七，頁 113。

²³⁴參照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七，頁 116。

²³⁵參照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七，頁 123。

²³⁶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一，頁 10。

²³⁷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四，頁 71。

著家僕協助拓碑，「有僕劉福者，善椎拓，攜紙墨以從，有所得，盡拓之。又有一僕，忘其名，因拓摩崖刻石，失足，墮崖死，文藻哭之慟」²³⁸，為學需要付出個人努力及代價，清人用心於此，也無怪乎成就斐然。

汪中亦雅好金石碑版，「嘗從射陽湖項氏墓，得漢石闕孔子見老子畫像，因署其堂曰『問禮』」²³⁹，宋儒彭紹升亦喜蒐集金石文字，曾告江藩曰：「朱子亦愛金石碑版，此《論語》所謂『游於藝，非玩物喪志也』」²⁴⁰，清儒多人喜金石文字者如：吳玉搢²⁴¹、宋葆存²⁴²、翁方綱²⁴³、桂馥²⁴⁴、江德量²⁴⁵、趙曾²⁴⁶等人，江藩列舉既多，而其關注所在，乃是金石文字大有助於校勘，又具古雅之趣味，則其用心，更可見儒者嗜古之一面。

二、清儒史學成就

1、史學

清儒皆治史學，乃是有經世致用之用意。黃宗羲始著《明儒學案》，「為學史之祖」，而其《宋元學案》則由其子百家與全祖望先後續成，可謂「清代史學之光」²⁴⁷。而在考史方面，則以錢大昕之《廿二史考異》、王鳴盛之《十七史商榷》、趙翼之《廿二史劄記》為三大名著。

錢大昕論其撰寫此書之目的云：「史非一家之書，實千載之書，祛其疑，乃能堅其信，指其瑕，益以見其美。拾遺規過，匪為齟齬前人，實以開導後學。」²⁴⁸而其對《史記》迄《元史》，詳為校勘、考釋，曾謂「史之蕪陋，未有甚於《元史》者」²⁴⁹，由於元代朝廷「所選史官，又皆草澤迂生，不諳掌故，於蒙古文字，素所未習，所以動筆即偽……因搜羅元人詩文集、小說、筆記、金石碑版，重修《元史》，後恐有違功令，改為《元詩紀事》」²⁵⁰，錢大昕獨力重修《元史》，

²³⁸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六，頁107。

²³⁹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七，頁115。

²⁴⁰參照江藩：《宋學淵源記》附記，頁35。

²⁴¹參照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一，頁10。

²⁴²參照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一，頁11。

²⁴³參照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六，頁97。

²⁴⁴參照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六，頁108。

²⁴⁵參照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七，頁113。

²⁴⁶參照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六，頁108。

²⁴⁷梁啟超：《清代學術概論》十四，與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》合編（台北：正大出版社，1974年10月），頁48。

²⁴⁸錢大昕：《廿二史考異·序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4年4月），頁1。

²⁴⁹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三，頁50。

²⁵⁰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三，頁50。

補前史之不足，對清儒史學成就而言，實乃一大功業。

洪亮吉由於「預修《宋元資治通鑑》，修陝西、河南各州《縣志》，是以深於史學，而尤精地理沿革所在」²⁵¹，故洪氏對於清代史學貢獻不小。另一人是程在仁，同樣長於史學，「尤精《二漢書》，嘗謂魏收有史才，陳壽、沈約皆不及也，良庭江先生亟稱之。」²⁵²而事實上，程在仁是列名於「宋儒」之中，而經研史籍固無異於「漢儒」，凡此皆是深具史才史筆之人。

2、輿地之學

清儒深於輿地之學者，為數不少。閻若璩對於山川地勢、州郡沿革，瞭若指掌，曾說到：「孟子言讀書當論其世，予謂並當論其地。少讀《孟子》書，疑滕定公薨，使然友之鄒問孟子，何緩不及事。及長大親歷其地，乃知故滕國城在今縣西南十五里，故邾城在今鄒縣東南二十六里，相去僅百里，故朝發而夕至，朝見孟子而暮即反命也。」²⁵³閻氏認為深知地理之學，乃有助於研經誦史，誠乃獨到之見，也證明清儒為學篤實之面向。

黃儀篤信古學，在經史中的地理及各家輿地，無不研究。曾論道：「班書〈地志〉所載諸川，第言其所出所入，而中間經歷之地，不可得聞，惟《水經注》備著之。然非繪畫，讀者不能了然於心目，乃反覆尋玩，每水各為一圖，如某水出某縣，向某方，流經某縣某方，至某縣合某水，某縣入某水，無一不具。閻若璩見之，不忍釋手，歎曰：『酈道元千古以下第一知己也。』」²⁵⁴，黃氏究心地理如此詳備，故其成就可觀。

顧祖禹生性好遠遊，足跡踏遍天下，後閉戶著書，撰《歷代州域形勢》九卷。又著有《讀史方輿紀要》，其內容「凡職方廣輿諸書，承偽襲謬，皆一一駁正，詳於山川險要及古今戰守之跡，而景物名勝皆在所略。讀其書，可以不出戶牖，而周知天下之形勢，為地理之學者，莫之或先焉。世所稱三大奇書，此其一也」²⁵⁵，梁啟超稱其「言形勢阨塞略盡，後人莫能尚」²⁵⁶，顧氏在輿地學成就，可謂首屈一指。

顧炎武所著《天下郡國利病書》，一直為當時學界所稱道，其中內容「聚天

²⁵¹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四，頁74。

²⁵²江藩：《宋學淵源記》附記，頁37。

²⁵³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一，頁8。

²⁵⁴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一，頁14。

²⁵⁵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一，頁14。

²⁵⁶梁啟超：《清代學術概論》十五，頁49。

下圖經，歷朝史籍，以及小說筆記，明十三朝實錄、公移邸報之類，有關朝政、民生者，酌古通今，旁推互證，不為空談，期於致用」²⁵⁷，顧氏參酌古今朝野資料，也實地去考察，而撰成此書，當可謂之極其詳備。

郝懿行亦著有《山海經注》，其書「乃實事求是之學，若近世標竊膚淺者，豈可同日而語哉」²⁵⁸。而許鴻磐所撰《雪帆雜著》，內容「皆辨駁地理之說，不在拙明祖禹之下，其論內地及外裔山川，瞭如指掌，蓋四方經緯，洞徹胸中，故不為皮傅之言也」²⁵⁹，郝氏與許氏皆能對山川地域，了然於心，真可謂之精通之士。而同樣究心輿地之學者尚有：胡渭²⁶⁰、洪亮吉²⁶¹等人，皆可見清儒學術用心，固不僅止於書籍考辨，更及於實地考察。

3、天文歷算

梁啟超謂「自明徐光啓以後，士大夫漸好治天文、算學，清初則王錫蘭、梅文鼎最專精，而大師黃宗羲、江永輩皆提倡之。清康熙尤篤嗜，召西士南懷仁等供奉內廷。」²⁶²此學中國早有淵源，然光大於清朝一代，學者精研此學，各有創發。

陳厚耀學問淹通，曾從梅文鼎受歷算，於是精通中西之術，而後深受皇上喜愛，常召至殿中，反覆問難，江藩稱讚其所撰天文術算諸書，乃「精於律法，視預為密，於考證之學，尤為有裨，治《春秋》者不可少此編矣」。²⁶³故精通天文歷算者，大有助於按覈《春秋》歲時記載，其對治經之裨益極大。

褚寅亮亦精通此術，「尤長於句股和較相求諸法，作《句股廣問》三卷」²⁶⁴，汪萊亦通中西之術，著有《衡齋算學》行於世²⁶⁵。同樣精於天文歷算者有：張敦仁²⁶⁶、楊大壯²⁶⁷、黃承吉²⁶⁸等人。

三、清儒其他類之成就

²⁵⁷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八，頁134。

²⁵⁸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六，頁108。

²⁵⁹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六，頁108。

²⁶⁰參照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一，頁12。

²⁶¹參照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四，頁74。

²⁶²梁啟超：《清代學術概論》十五，頁50。

²⁶³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七，頁109-111。

²⁶⁴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二，頁37。

²⁶⁵參照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六，頁108。

²⁶⁶參照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一，頁11。

²⁶⁷參照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七，頁124。

²⁶⁸參照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七，頁124。

1、文章之學

清儒崇尚專家之學，考據之功，亦用於文學，如黃宗羲論古文，有其獨到之見，其曰：「唐以前句短，唐以後句長；唐以前字華，唐以後字質；唐以前如高山深谷，唐以後如平原曠野。自唐以後，爲文之一大變，然而文章之美惡不與焉，其所變者詞而已，所不變者，雖千古如一日也」，江藩見此番見解，不禁嘆曰：「此論足以掃近人規撫字句之陋習矣！」²⁶⁹誠乃由文字而入於文學。

汪縉喜爲詩，以陳子昂、杜甫爲則，江藩述其「不二師見其〈虎邱題壁詩〉，詫曰：『此白衣大有根器』，後見〈寒山捨得詩〉，喜其字字句句，皆從性海流出，於是以詩作佛事，有空山無人水流花開之妙境，非若王安石之句摹字擬也」²⁷⁰，又工於古文，江藩謂其「人所不能言者能言之，人所不敢言者能言之，人所不能暢者能暢之，人所不能曲者能曲之」²⁷¹，故能言人所不能言也，於古文能暢所欲言，實得文章之精神也，而江藩所論，固不止於學術之面向而已。

王昶詩文俱佳，「詩宗杜少陵、玉溪生，而參以韓柳。古文則以韓柳之筆，發服鄭之蘊，功業文章，炳著當代」²⁷²，著作甚豐。汪中同樣尤善詩文，「君少喜爲詩，不爲徘徊光景之作，尤善屬文，土苴韓歐，以漢魏六朝爲則」²⁷³，由此可見，清儒作詩爲文，皆效法唐代杜甫、韓愈、柳宗元等人之作，原本就深具文人之涵養，而施於考據，亦有其成就。

凌廷堪少時本棄書學賈，一日在友人家看見《詞綜》、《唐詩別裁集》，攜回研讀，從此竟能詩及長短句，時人見之大爲驚奇，後從事讎校工作。²⁷⁴而黃承吉工詩、古文，爲文「自出機杼，空無依傍，寓神明於規矩之中，不屑爲世俗之詩文者也」²⁷⁵，黃氏能於詩文有所創新，不爲多見。彭紹升治古文，「言有物，而文有則，熟于本朝掌故，所著《名臣事狀》、《良吏述》、《儒行述》」²⁷⁶，皆能信而有徵，可傳於後世。

張爾岐亦工古文詞，著有《天道論》、《中庸論》、《篤終論》，受時人推

²⁶⁹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八，頁 130-131。

²⁷⁰江藩：《宋學淵源記》附記，頁 34。

²⁷¹江藩：《宋學淵源記》附記，頁 34。

²⁷²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四，頁 59。

²⁷³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七，頁 116。

²⁷⁴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七，頁 122。

²⁷⁵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七，頁 124。

²⁷⁶江藩：《宋學淵源記》附記，頁 35。

崇²⁷⁷。孔廣森尤善於駢體文，連時人汪中、孫星衍皆十分讚賞。²⁷⁸ 宋綿初尤長於詩，撰有《韓詩內傳徵》四卷。²⁷⁹ 張履祥頗能詩，朱彝尊稱讚其詩「無頭巾氣」²⁸⁰。而同樣工於詩、詞、古文者尚有：洪梧²⁸¹、羅永符²⁸²、鈕樹玉²⁸³、趙懷玉²⁸⁴、閻詠²⁸⁵、宋葆存²⁸⁶、賈田祖²⁸⁷等人既深有文學涵養，而於考據，亦卓然有成。

2、律呂

清儒亦有精通樂律者，惠士奇撰有《琴瑟理數考》，其論到：「歷代之樂，皆患聲高，隋唐以來，惟奏黃鍾一均，而旋宮之法廢矣，古法盡亡，獨存於琴瑟，竽孔疎密，取則琴暉」²⁸⁸，江藩稱其「書成之後，惟嘉定王進士恪見而喜之，餘莫能解也」，而黃宗羲於少時，「取餘姚竹管肉孔勻者，截為管而吹之，知十二律之四清聲」²⁸⁹，於是著《律呂新義》二卷，真可謂之奇葩，另外楊大壯²⁹⁰、錢塘²⁹¹也精通律呂之學，實為不易，於此專家之學，清儒皆深味而有得，其用心所在，固足以闡發幽微矣。

貳、學術研究情形

梁啟超特別於《清代學術概論》中論述清儒之間學術研究之往來，云：

清儒既不喜效宋、明人聚徒講學，又非如今之歐、美有種種學會、學校為聚集講習之所，則其交換智識之機會，自不免缺乏，其賴以補之者，則函札也。後輩之謁先輩，率以問學書為贄（有著述者則賸以著述），先輩視其可教者，必報書，釋其疑滯而獎進之。平輩亦然，每得一義，輒馳書其

²⁷⁷ 參照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一，頁 15。

²⁷⁸ 參照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六，頁 104。

²⁷⁹ 參照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七，頁 123。

²⁸⁰ 參照江藩：《宋學淵源記》卷下，頁 15。

²⁸¹ 參照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六，頁 103。

²⁸² 參照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六，頁 103。

²⁸³ 參照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四，頁 62。

²⁸⁴ 參照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四，頁 74。

²⁸⁵ 參照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一，頁 9。

²⁸⁶ 參照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一，頁 11。

²⁸⁷ 參照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七，頁 112。

²⁸⁸ 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二，頁 20。

²⁸⁹ 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八，頁 130。

²⁹⁰ 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七，頁 124。

²⁹¹ 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三，頁 51。

共學之友相商榷，答者未嘗不盡其詞。凡著一書成，必經摯友數輩嚴勘得失，乃以問世。而其勘也，皆以函札。²⁹²

書信往返，為清儒學術交流重要之方式，江藩也特別留意彼此問難交流之事，提供清儒學術更為豐富之觀察面向，學者間彼此以學問交相問難，則可見學者的學術觀點與學識涵養。江藩在京師之時，有夫己氏問：「叔嫂有服乎？無服乎？」江藩回答：「據《禮經》，是叔嫂無服也」，而夫己氏出示萬充宗〈叔嫂有服辨〉一文，江藩大笑曰：「子墨守鄭學，知其一而不知其二」，歸而後讀沈彤《儀禮小疏》曰：「夫皆為之總，妻皆降而無服」，方得其解，「此可以息充宗之狂喙矣……乃知果堂肄禮之精審如此」²⁹³，沈彤治經如此嚴密，無怪乎其於治《禮》堪稱大師。

另外，江永有一日，拿歷算中諸事問於戴震，曰：「吾積疑十有餘年，而未剖析者，君為之比較，言其所以然」，戴震予以分析，江永曰：「今之定九也！」²⁹⁴所以稱美戴震於歷算之學，可媲美梅文鼎，可見戴氏於算學有獨到之處。而江永亦是一代通儒，精於《禮》。三禮館總裁方苞自負其學，見江永，以所疑之《士冠禮》、《士昏禮》數則問之，江永從容以答，方苞負氣不服，江永亦微笑以對，可見得其學養豐厚，死後戴氏曾為其寫〈行狀〉，「稱其學自漢經師鄭康成後，罕其儔匹」²⁹⁵，誠無過譽。

清儒間常以彼此著書相質問，在反覆問難之餘，以精進其學。如顧炎武遊太原，閻若璩以《日知錄》質問他，顧炎武十分折服，歸而後改訂數則。閻氏又曾與汪琬辯論，後糾出汪琬所著《五服考異》之誤謬²⁹⁶，可見閻氏喜與人相互切磋，而其學識甚豐，亦可得見。

陳厚耀學問淹通，深受康熙敬重，時而召至上書房，研究其學。皇上曾問其側景是何法，「厚耀求指示，上曰：『此法甚精，不必用八線表』，即以西洋定位法、開方法、虛擬法寫示，又命至座旁，隨意作兩點於紙上。厚耀隨點之上，用規尺畫圖，即得兩點相去幾何之法」²⁹⁷，陳氏之天文歷算，甚已超越其師梅文鼎，可謂青出於藍，而甚於藍。

²⁹²梁啟超：《清代學術概論》十七，頁 55。

²⁹³參照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二，頁 29-30。

²⁹⁴參照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五，頁 87。

²⁹⁵參照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五，頁 78-79。

²⁹⁶參照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一，頁 7。

²⁹⁷參照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卷七，頁 109。

徐枋屢次以書問學於朱用純，其答曰：「竊觀吾兄，酬應人倫，微喜諧謔，雖無損大節，要非君子所宜為何，《書》云……溫恭克讓所以為堯之德，允恭溫塞所以為舜之德也」，徐枋又問其「先須發悟，而後可以言學」，用純回答：「聖賢之學，無過一敬……一敬而天下之理得，天下之能事畢」²⁹⁸，研究固然入其精微，亦同樣施於人倫行事參鑒之用，此則宋學固守之門徑。

劉忠介主誠意，王朝式守良知，宋儒往往持其異同，劉忠介曾寫信致王朝式，問其學為儒為禪乎？曰：「……諸君子言禪言，行禪行，律禪律，何以道學為？諸君子自信愈堅，世人疑之愈甚，今將永拒人於流俗，不得一聞聖人之道，是亦諸君子之過也……。」王朝式得其書，不辨也不慍。²⁹⁹宋儒間為其所學固然有所不同，或有彼此詰難，但同樣也不失儒者之風範。

參、小結

綜上所述，我們可以審視出清儒學術之成就，然其中可觀察：

首先，清儒在學術成就方面，有幾項特色：一是對研究學問之執著，學者治學態度嚴謹踏實，主張無一事無出處，無一事無來歷，窮年累月搜集材料，即使曠日費時，動輒一、二十年歲月，甚至材料千里之遙，亦蒐集不懈，終能完成曠世巨作。二是雖言宋儒重義理闡釋，然其亦重視小學，像是高愈、羅有高等。三是漢儒在經學方面，多從訓詁、聲韻及考證入手，以解釋經籍，故其著作多以校讎為主，對中國二千年來的文獻典籍，進行大規模的總結整理，使豐富的文化遺產得以保存，更為後人提供方便之研讀資料³⁰⁰。

其次，清儒之學術成就多有創發者，像是江聲在小學方面有所創見，而其他領域像是史學、輿地、天文歷算等領域，清儒也皆能有所創見。至於承繼前人成果，而校正訛誤者，像是《易》學、《春秋》學領域，以及在詩、詞、文章方面，也都能承前而創發，饒富清儒治學特色。

最後，在學者彼此交相問難過程中，對於學問有所增進，甚至彼此互為稱道，像是江藩對於沈彤之《禮》學，康熙皇帝對於陳厚耀之歷算學，皆為學界之佳話。然而亦有在切磋學問之時，有負氣者，像是方苞對於江永所提出《禮》學之見解，

²⁹⁸參照江藩：《宋學淵源記》卷下，頁 16。

²⁹⁹參照江藩：《宋學淵源記》附記，頁 30。

³⁰⁰特色三可參照王俊義、黃愛平：〈乾嘉漢學論綱〉，《清代學術文化史論》（台北：文津出版社，1999 年 11 月），頁 46。

不以爲然，竟負氣而走，則亦顯示當時問難辨駁之形態，時至今日，其意氣所爭固不足道，然其學術所見，則啓發後學多矣。

故清儒有極高的學術成就，無論在經學、史學，抑或是詩、詞、文章、律呂，皆能有所專精，便如梁啓超先生所云，清代學術堪稱爲前代學術之總整理，可見其燦爛輝煌。